

出版说明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的《让我们说实话》一书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法国议会选举前夕出版的，它实际上是马歇的一份阐述法共对内对外政策的竞选纲领。书中也阐述了法共对中苏两党和对“欧洲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

当时马歇在书中对苏联国内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并表示不能接受是否“忠于苏联”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的说法。但自一九七九年法共二十三大以来，法共对苏联的态度已有了一些变化，它虽不否认同苏联存在分歧，但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总的说来是积极的”，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苏共站在一起。

在同我们党关系问题上，书中一面承认我粉碎“四人帮”后在经济、社会方面“作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纠正”，但仍攻击我对外政策是“为帝国主义效劳”。

此外，本书发表于法共同社会党结成的“左翼联盟”发生分裂后不久，书中对社会党进行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一九八一年五月，在法共的支持下，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当选为总统，在同年六月的议会选举中两党又联合取胜，组成议会多数，并就共同施政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兹将该声明作为本书附录，供读者了解法共在新形势下，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态度的一些变化。

目 录

前言	1
1 你们说法国人生活得不好。难道你们没有 夸张吗?	3
2 但是, 马歇先生, 还存在着危机.....	11
3 大家都在谈论变革。而你们共产党人提出 什么样的变革呢?	25
4 你们说: 你们党的政策可用一个词概括: “民主”。这是为什么?	38
5 你为什么如此始终不渝地酷爱民族独立? 难道这不会使法国陷于孤立吗?	57
6 你有时谈到左翼联盟, 有时谈到法兰西人 民联盟。你既把法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 党, 又称之为联合的党, 这岂不是有矛 盾吗?	71
7 今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共、社会党和左翼激 进党人运动关于修订左翼共同纲领的讨 论中断了。左翼向何处去? 这种形势无 损于变革吗?	94

8	共产党的学说同你们向天主教徒提出的联合建议相容吗？	110
9	你们怎样把热爱民族独立同你们的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121
10	自从你们的二十二大之后，大家都说你们变了。如今的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你们要的是什么社会主义？	137
附录	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关于共同施政的联合声明	159

前 言

法国人，不论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还是对头（多少自以为是我们对头的人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都把目光转向共产党。他们有理由把共产党视为国家生活中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他们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以及我们提出了什么建议。他们由于意识到正生活在法国的一个重要时刻，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因而更希望了解这些。当然，他们从右翼或左翼那里都听到了许多关于我们的情况。但是，凭着经验，他们认为最好还是取得“第一手资料”，因此就直接向共产党人提出问题。

我了解这些。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国内走了很多地方，从国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举行群众集会，参加辩论，在低租金住宅里、工厂、农场或村庄的广场上与人们进行交谈。此外，我每天要收到数十封来信；如果政治生活中发生什么重要事件，这些信件的数量更是十分可观。

在不同的场合向我提出的无数问题中，有些是经常出现的，我算了一下有十个。这是一些大的问题、主要的疑问，涉及到我国的男男女女极其重视的一些方面。他们的政治选择正取决于对这些重大问题所作的答复。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所作的选择决定着自

的前途。因此，他们应该能在完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决断。

正是为了向他们提供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对正在我国进行的全国大辩论作出贡献，我想从我的许多演讲、报告和文章中那些人们感到零乱的观点和材料出发，来回答这十大问题，这些是人们向我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最常见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合情合理的。

我将按我的习惯坦率地作出回答。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

你们说法国人生活得不好。
难道你们没有夸张吗？

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热爱它那无限温暖的天空、它千变万化的景色和肥沃富饶的土地。我们热爱它，因为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工程师、艺术家和科学家一代一代地用他们的劳动塑造了它的形象，并将他们努力的成果传给我们。

在朗格多克的葡萄园或是诺曼底的牧场前，在坦卡尔维尔桥或协和广场上，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或在“比所有圣人和所有国王都更高大的”夏尔特尔大教堂前，谁能对这些法国天才的延续不断和丰富多采的明证无动于衷呢？

法国是一个富饶和高度发达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和高度发达的经济力量。它的工人和农民以聪明灵巧而著称；它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为科学和技术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在世界上受到重视；它的作家和艺术家受到全世界的仰慕。

我国的男子和妇女因几个世纪来参加争取进步和自由的

伟大斗争，而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我国人民给予流亡者和受迫害者一贯的慷慨款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是的，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不是为平庸和屈从而诞生的。

可是，今天，有人在摧残我们的法国。

本来可以使所有的人在我们今天的土地上生活得很好，但是，在这个将真正使人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科技革命的年代里，我国的许多劳动者及其家庭却生活在一种不符合时代的贫困之中。

贫困…… 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每次讲话中以那种贵族的语气来谈到人民时总要提到这个词。他每次都特别重视地“关注”这一问题。真是好样的……！

从舒适的住宅里领导我们国家的人们在打量法国时，只看到几个贫困的“孤岛”和几户苦难的人家。他们谈到一些“未从生产增长中得益的人”、“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未受到优惠的人”。真不知羞耻！

贫困、苦难是普遍现象

一九七六年，在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全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后，我曾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法国，今天至少有一千六百万在职或失业的男女劳动者无法满足他们自己及其家庭最起码的需要，即包括吃、穿、住、置备家具、保养身体、使孩子得到最低限度的教育和职业专长以及娱乐休息。而在现代法国的条件下过这般生活，就是生活在

贫困之中。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太夸张了……”

但是，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确定贫困状况的条件所得出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天处在这种贫困状况中的法国人达一千七百万。可见，情况正在很快地恶化。

苦难、贫困，这对于成百万家庭来说就意味着各方面的紧缩，包括那些对孩子来说本来是必需的东西。在许多工人家庭里，肉越来越少了，麦淇淋代替了黄油，水果吃得太少——每年却有成千上万吨的水果被销毁。人们最大程度地限制新衣服的购置，不买书籍，放弃看戏，甚至放弃休假。

苦难，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可耻地表现为低工资。大家来评一评：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绝大多数工资收入者的每月所得低于两千五百法郎。

在同一时期里，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工人每月净收入不到两千法郎，而百分之十的工资收入者只能得到每月一千四百五十法郎的菲薄工资，也就是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我就不谈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了，这些不平等已被普遍公认为我们社会的标志。

苦难，表现为失业。它已经影响到一百五十多万男女，其中七十万是不到二十五岁的青年。百分之五十三的失业者领不到任何补贴。这里还只是指全失业。

对人的完全蔑视

后果不仅限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它已经危及

个人的尊严和健康。人们对失业者的难以容忍的悲惨遭遇是永远说不完的。他们的生活，就是毫无希望地寻找一项靠不住的工作——不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就是在职业介绍所门口排长队和低声下气地去求人。就是老缠着你的那种可怕的、难以忍受的被遗弃、无所作为、虚度年华的感觉。这是人力的浪费，对国家是不堪设想的损失！

苦难，就是社会保险、家庭补贴或退休金的汇票晚到而带来的焦虑。

就是开学时一系列的开支，理应引以自豪的时刻却成了使人畏惧的关头。

对于走出校门的青年来说，就是忧虑取代欢乐：“我能找到工作吗？又是怎样的工作呢？”

对于许多老人、许多残废者来说，苦难，就是一天天地混日子。

苦难，就是当人们罄其所有仍无法支付贷款、房租、煤气、电费的收据或苛捐杂税时，对执达员或警官所持的恐惧心理；就是被扣押和被驱逐——这种情况越来越经常发生。

苦难，也是引起如此疲劳、衰竭、忧伤以至人们根本无法“支撑”的劳动条件，在大企业中尤其如此。

法国是世界上每周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许多情况下，生产速度的加快已经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使人筋疲力尽的劳动强度是千百万工人每天的现实。

职员、技术人员、甚至一部分工程师也都受到劳动条件恶化的影响。

工人阶级是不平等的首要受害者

然而,受影响最深的是工人,首先是占工人阶级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专业化工人。

他们今天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在工厂里,劳动负荷过重,交货的期限越来越短。除劳动时间拉长、劳动强度加剧外,还要加上恶劣的卫生条件、高温、潮湿、通风不足、噪音、拥挤。长期积累的疲劳持续不断,劳累过度导致筋疲力尽和过早地衰竭。

在某些车间里,每天都有一些工人得了神经官能病或昏厥。工伤事故很多,平均每天有十五名工人因此而死亡。劳动分工过细、不停地重复单一动作使工人变成机器的附件,使他们的活动完全失去意义。

由于缺乏培训的实际条件,工人们被迫将其一生拴在一个束缚住自己手脚的活计上。在我们这个科技空前发展的时代里,成千上万的青年却无法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知识和喜爱的职业。他们的前景只是无休止地从事乏人的和毫无意义的单调劳动。

下班离厂后,紧张状态并没有稍微松弛。要去挤超载的极不舒适的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妇女们还要拚命赶时间,从企业赶到地铁或公共汽车站,下车后赶到学校或托儿所接孩子,再从那儿赶到商店或回家。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化以及噪音和城市污染,家庭也远不总是一个可以使人松弛并得到休息的避风港。

这一切之后，还有什么真正的生活呢？在我们党最近组织的一次关于专业化工人状况的听证会上，一位年轻妇女发自内心的直接呼喊——“要生存”来回答人们的提问：“夫人，一句话，您想要什么？”当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激动，我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这个象口号一样响亮的呼声出自一个女工之口绝非偶然。因为妇女特别遭受现行制度所造成的社会极端不平等之害。工资不平等：女工的平均工资要比男工低百分之二十八。这样，近三分之二的女工每月要少拿二十万旧法郎。职业不平等：她们只能从事几种职业。就业不平等：求职者中，妇女的人数按比例来说要比男的多得多。在夫妻和家庭地位中，她们还遇到法律上的不平等。

一般来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职员工作速度更快，劳动条件更差，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他们的工资购买力，即这份工资所能提供的财物和服务在减少。根据劳工部的季度调查结果，并以最接近实际的总工会发表的物价指数作为基础，便可看到，按家庭情况的不同，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以来，工人每月净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百分之六至八。对于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来说，由于部分失业的原因，工资是在直接地、急剧地减少。这些勤劳的家庭由于收入如此不足而不得不紧缩这项或那项开支以平衡收支。以精打细算勉强维持的平衡是根本不牢靠的，稍遇一点“沉重的打击”，便是一场灾难。

绝大多数法国人生活得不好

在这些面临最大困难的人之外，也绝不是优越和富裕的生活，恰恰相反。

对于广大劳动群众，包括技术员、工程师、干部及一般脑力劳动者来说，在他们今天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他们实际拥有的物质福利和精神享受的可能性之间已出现一道鸿沟。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也在不同程度上恶化。

没有一个劳动人民阶层能得以幸免。

农民的实际收入将连续第四年减少。为了勉强度日，广大农民只得更艰苦、更长久地劳动，而他们大多数人从未得到休息或假期。他们只得推迟必需的房屋修缮，把一切都用于购买土地和机器，债务越来越重，还债成了终日的烦恼。许多人离乡背井；农村人口正在加速外流。

手工业者、小商以及中小企业主越来越喘不过气地受到大银行和工业托拉斯的控制，受到国家的行政和捐税压力。一九七六年倒闭的企业达一万二千家，事态还在迅猛发展。

处理市政建设、住房、学校、公共卫生、文化和体育问题的方式也促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的恶化和质量的下降。在这些方面，国家以所谓的改革为借口，越来越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它把住房、知识、健康、艺术和娱乐变成了牟取利润的手段并迫使人民接受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它的办法很简单：如果你想让孩子上学，那就付钱！如果你要公路，那就付钱！如果你要治病，那就付钱！只要是百万富翁掌权，你若有钱，就

有一切。否则，你和你的家庭就活倒霉。政府和大老板就是这样在损害社会保险这一工人的伟大斗争成果给工资收入者带来的基本社会利益的。他们要既提高劳动者缴纳的会费而同时又降低报销额。这一整套反动的方针导致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的加剧，人民的要求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因此，生活的困难今天已不仅仅沉重地打击着工人阶级——它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但却受害最深，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打击着广大法国人。的确，我国的绝大多数男子、妇女和青年都生活得不好。

这种状况是我们所要改变的。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消灭贫困和拮据，我们要保障生存的安全，我们要促进社会公道，我们要发展使社会和国家得益，而不是以利润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

一句话，我们要改变生活。

(2)

但是,马歇先生,还存在着危机……

是的,确有危机。

国民经济在衰退。我国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能力没有使用,四分之一的工业已受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债状况在恶化。国内有的地区过度发展,有的地区则毫无生气,它们被剥夺了民主权利。出生率在下降。国家的恶劣境况在各个领域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过去作为自由的明灯的法国,今天的民主正在逐渐减少以至化为乌有。它的主权被一块一块地侵蚀。今天,我国农民的命运是在布鲁塞尔决定的,我国货币的命运则在华盛顿裁决。说法国正处在危机之中,这在今天已是明显的事实。国家领导人在长期否认危机的存在后,现在把这场危机作为一种挡箭牌,为他们的紧缩政策、物价上涨、失业及社会设施不足进行辩解。

但这是什么危机?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石油为借口

据右翼人士(以及非共产党的左翼政党)说,危机的原因

是在外部。他们说：这是石油生产国的过错，这些国家为了重新掌握民族资源，而提高了这个必不可少的产品的价格。我们应首先注意到，这些国家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克服他们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工业品涨价所造成的影响。此外，石油价格的提高只耗费国民收入的极小部分，如果大的石油公司不从中捞取利润（而且是很高的利润），如果我们国家的供应有多方面的来源，这笔开支本来是不难支付的。

人们更普遍的说法是：危机带有国际性。这场危机确实涉及到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卡拉汉先生的大不列颠或在施密特先生的德国，甚至是在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情况确实也很糟糕。但是，这个国际性危机渊源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并随着这些国家中危机的发展而发展。

浪费已超出了法国的能力

有人还说：法国入不敷出。但是，超出了法国能力的是，水果和蔬菜被销毁；是数十万套住房因租金太贵而闲置；是向米歇兰公司提供一千五百亿旧法郎，而该公司却同时在美国投资一千四百亿旧法郎；是昂潘男爵卖给唯一的买主法国电力公司的核能锅炉的价格在四年中翻了一番；是从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三月支付了一万四千亿旧法郎用于法郎投机——这是富尔加德^①自己供认的；是把几十家完全能够维持经营的企业关闭和把有时是全新的机器作为废铁处理。有一天我曾在电视台举了佩阿热—德—鲁西荣的罗纳—普朗克工厂的例

^① 当时的财政部长。——译者

子，成百万的电视观众可以从我给他们展示的照片上看到一家非常现代化的工厂，这个厂每年可以生产七千吨醋酸丝，几乎相当于法国的需要量（我们每年消费七千吨左右的醋酸丝）。然而，由于该厂装备了进口机床而花钱过多，罗纳—普朗克托拉斯把它关闭了，同时却又到巴西、阿根廷、西德去建厂。结果怎样呢？法国目前须以比过去高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格从国外进口这项材料，而一些法国劳动者却面临失业……超出了法国能力的还有不考虑制造取代方帆飞机的另一种型号的飞机，而给达索公司提供资金来生产应予淘汰的水星100型飞机，并给国内航线补贴来购买这种飞机……浪费的项目每天都在增加。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报纸上在同一天发表了三则消息：“法国号”大客轮贱卖给了一个外国百万富翁；法国钢铁业竞争能力最强的高炉之一在蒂翁维尔关闭；两百万颗菜花在布列塔尼地区被销毁……正是这些糟塌和浪费超出了法国能力。谁应对此负责呢？当然不是工资收入者，也不是农民；他们是这种状况的受害者。

一些人的不幸使另一些人发财致富

现行制度的辩护人把危机解释成似乎在行程中必然发生的事故，好象一块石头突然来“卡住”了制度的运转，而制度本身则是无可非议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研究一下。

首先，在法国并不是每个人都遇到危机。相反，一切都表明，一些人的不幸使另一些人发财致富。因为，如果我们国家

有一千七百万穷人的话，同时却还有几十万享受特权的富人。他们傲慢地摆阔，一个晚上随手就花掉一个工人（甚至是一个工程师）一年都挣不到的钱。事实上，阔佬们从未象今天这样富裕。今天，二十万个家庭分享着一千一百亿新法郎去掉税收的净收入。与此同时，一百八十万个家庭每户每月却只有一千二百五十法郎来维持生活……还有，在法国的二十一家最大的工业垄断集团一九七六年所获得的利润达四百二十亿新法郎，即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我们所知道的还只是百万富翁们巨大财富的浮渣，只是大工业和金融垄断势力的利润冰川中浮面可见的部分。不，在大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没有危机，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惊人的财富是从对劳动者的剥削、从劳动者的困难和贫寒中获取的。例如，我们从《费加罗》报上得知，珠宝工人精心制作的终极目的就是给他们富有的买主以劳动的传统标志，最好是一个美丽豪华的工具。据说，这是“重新评价体力劳动”运动的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可以买到用氧化钢制成的普通式样的活动扳手，用来作一颗五克拉钻石的托座。价格多少呢？两千四百万旧法郎！我们从另一份报纸上获悉，戛纳夜总会的转盘一夜之间就吞进了五十亿法郎，赌客中有施奈德—克勒佐—卢瓦尔的老板昂潘男爵……

换句话说，少数人生活阔绰淫荡，而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却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受剥削、受压迫、受侮辱。这就是现行制度的基础。豪富们把这种制度称为“自由主义”；劳动者和我们则径直称之为资本主义，而他们是有道理的。

的确，现行制度是以一个简单的、但却令人愤慨的事实为

基础的，即创造财富的人并不享有这些财富。一股新的垄断势力控制了个国家以及组成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这就是金钱势力。这股势力信守一个毫不留情、骇人听闻的逻辑，即大垄断集团从不满足于他们所获得的（尽管已是巨额的）利润。资本的积累和超积累，这就是他们的法则。他们总是嫌资本不够多，总要更多的资本。在这方面，他们从目前的国家那里得到毫无保留的帮助。

以钢铁业为例

钢铁业的例子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

钢铁工人的劳动条件越来越艰苦和难以忍受。骇人的劳动强度、温度高达一千二百度的高炉，吸进肺部的气体，超过规定标准十倍的噪音，无人过问的安全，这一切使人未老先衰。多少万钢铁工人和矿工没有安眠药就无法入睡，没有镇静剂就无法生活！今天，百分之七十的洛林钢铁工人活不到退休年龄。于齐诺尔—敦刻尔克死亡的八十三人又怎么解释呢？其中的三十八人是在一年之内死去的。

所有这些付出了如此艰辛劳动的人又是怎样得到酬劳的呢？至少该让他们安定地、象样地生活，面无需每分钱的开支都打个算盘了吧！？不！部分失业使他们当中成千上万人的工资每月减少了二百至六百法郎，而同时又有数万人被抛入街头。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中，钢铁业裁减了四万六千人。而这还不够，大雇主说，从现在起到一九七九年还要减掉一万六千人。

然而，国家又干了些什么呢？在最近的十年里，它向钢铁业大托拉斯提供了一百十五亿新法郎。这些托拉斯用这笔钱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毁坏了工厂，把生产设备和资金输送到国外，剥夺了诸如洛林和北方省整个地区的命根子和生存手段，使我国经济的关键部门遭受沉重打击。于齐诺尔和萨西洛尔工厂倚仗政权的支持在北方省和洛林地区所进行的破坏比这些地区在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的损失还要大，这样说并不夸张。

法国的主人

那么，谁应承担 responsibility 呢？是那些大企业和政府的领导人。

在一九七八年，拥有一个甚至几个车间、剥削几百名甚至几千名工资收入者已不足以成为“数得上”的资本家了。四十年前，人们曾谈到统治法国的“两百家族”，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银行和工业巨头以及大跨国集团的时代，他们每家剥削着数万名劳动者，包罗了项目繁多的活动，拥有巨额资本。这些集团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信念：利润。他们人数极少，却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心脏和最坚强的核心。他们冷酷地支配着整个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的所有其它部分。

二十五个金融和工业集团统治着法国社会，其中某些集团拥有更大的权势。苏伊士金融财团作为股东参与了一百八十家法国公司（其中包括最大的公司）和一百三十家外国公司的事务。巴黎荷兰金融财团参加了三百三十家法国企业和七十家外国公司的董事会。

这些集团将手伸向四面八方，并把他们的权力集中在一起，兴建或拆毁工厂、办公室、实验室、地区和学校，一句话，它们左右法国经济。它们决定着成千上万名工资收入者的工作和生活。

它们还攫取国家的权力。今天，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从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和他的几名部长的生涯来看，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垄断集团的直接代表就在各部的办公室和委员会里相见。

今天，正是这些工业和银行的现代垄断势力成了法国的主人。它们对成千上万的工资收入者进行剥削和超剥削。不断把越来越多的经济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把它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一些向来属于小生产范畴的新部门，迫使农民背井离乡，导致小企业破产。它们掠夺公用资金，并使国家的一切手段为它们服务。它们与国家一道筹划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它们把主要的资源据为己有，诈取储户的钱财，缩减用于社会设施、学校、住房和医药方面的资金，积累并集中了巨额的私人资本。

多国公司的活动

还必须指出，它们的活动一直伸展到国界以外，其结果是损害国家的独立。因为，法国和外国资本的结合、多国公司的建立往往使决策和研究的中心转到国外，尤其是美国。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建立机构并进行活动的多国公司中有四分之三是由美国领导的。自一九七一年起，美国托拉斯在国外所

获的收入等于它们在美国本土收入的一半。在法国，多国公司渗入的面很广，包括核能、石油、机械工业、电力器材、电子、化学、食品工业等部门。政府不仅容忍这种活动，而且还给予鼓励。然而，多国公司远非进步的使者，相反它们夺走了进步。由于它们的目标与国家利益毫无共同之处，它们不惜关闭法国工厂，解雇工人。他们不择手段地寻求最高利润，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不稳定和货币混乱。

这种侵吞绝大多数人生产的财富，这种大规模的抢劫使国家付出了重大代价。

当前发展的特点是，大托拉斯疯狂地追求在最短时间内捞取最高利润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地违背了经济需要以及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制度的矛盾尖锐到使制度本身解体并运转失常的地步。国家的统治者竭力在他们所感兴趣的部门中积累投资，而现存的潜力却尚未完全得到使用。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加入利润竞赛。他们寻求在一些寄生生产、投机活动和国外投资中获取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当法国群众艰苦劳动而生活糟糕的时候，一些工厂被关闭，一些工人和年轻的毕业生失业，科技进步受到阻碍，庄稼被毁坏，几十万套住房因房租太贵而被闲置一旁（为了建造这些住房，一些市区遭到破坏），成百万儿童的智力和才能被荒废。

因此，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定时机下偶而发生的危机，不是一种神秘的疾病。它有着明确的根源，即：大垄断集团侵吞国家的资源和人民的劳动成果，并将其完全运用于私利的目的。因此，这不是制度的运转问题，而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法国社会的全面危机

所以，早在一九七一年，即在经济衰退之前，我就在《人道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场危机的存在及其全面的性质。我当时指出这是一次法国社会的危机。观察家们对这一分析表示怀疑。然而，如果看一下此后事态的发展，人们就不难看到：不安、纠纷、阶级斗争，即震荡着这个社会的各种性质的矛盾正在扩大和尖锐化。

事实上，这场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性的，也是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的危机。

说它是社会危机，因为工人阶级和今天远远超出工人阶级范围的成百万其他劳动者已起来反对如此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利益的方针，也是因为，阶级斗争由此而得到发展。

说它是政治危机，因为为大资本效劳的国家今天插手于一切事务；因为希望为整体利益服务的男子和妇女，不论他们是在公共部门或是在司法部门、军队、甚至是在警察局里工作，都在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有时也拒绝继续为大的私人资本利益服务；因为变革的愿望正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增长，掌握了领导权并享受特权的少数人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专断、暴力、非法手段和独裁来维持其统治。

说它是思想和道德危机，因为作为上层人物行动准则的利润法则、强权法则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使犯罪、腐败、色情和撒谎发展起来；因为当权阶层在培植伤风败俗和腐朽堕落；因为凡是大胆、创新的思想 and 理想都是革命

的，而统治着我们的主子，犹如一七八九年以前死抱住自己的特权和领地不放的贵族，除了拚命地维护腐败的制度外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目前的制度无视人类进步

许多评论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提到“文明危机”。这一评价有其真实的地方，因为由执政的资产阶级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那种社会已经越来越无法促进为大众服务的物质、科学和文化进步，以及民族的兴旺、人类价值的充分发挥。它没有能力向人民提出一项宏伟规划，给青年以新的、崇高理想。更糟糕的是：它使人类遭到摧残。

右翼政客们喜欢把自己装扮成秩序、公众安宁和道德的维护者。然而，除了他们所支持的制度外，又有谁在培育混乱、暴力和不道德行为呢？

暴力？对于被解雇的劳动者、对于这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即工作权利的一百五十万男子和妇女来说，还有什么别的暴力呢？对由于学费太贵而不得不中断孩子们学习的家长，对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任何工作的青年来说，还有什么别的暴力呢？

暴力？使用暴力的是老板，包括工厂中的私人卫队和警犬；是动用警察力量反对罢工工人的政府当局；是名称不一的暴徒集团。这些集团砸玻璃窗、抢劫和袭击的行为能如此轻易地得到发展而不受惩罚，致使人们不能不认为内政部长一定知道是谁在鼓动和包庇他们。

暴力？它象色情一样展示在电影银幕上和我们城市的墙壁上，蔓延到完全受利润所支配的商品生产中。它表现在便于人们进行丑恶投机的不合规定的市政建设中，从而导致住房质量低劣、生活环境恶化和城市污染。

事实是，压在我国身上的这种制度无视人类进步。我已说明它造成了多大的经济浪费！在这一点上，还必须提到人力的浪费。事实俱在：人们今天注意到与忧虑相联系的疾病在增加；失业者自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又有多少万劳动者在用镇静剂来克服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广而言之，对于个人来说，这个制度意味着什么呢？没有发展前途，积极性受到压制；健康的、互相信赖的和慷慨无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甚至无法实现；提高文化素养、看书、外出、走亲访友遇到种种障碍；经常感到生活得不美满、不完善，确信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这种形势直接打击着青年。众所周知，对这一切缺陷和权利的被剥夺，青年们感受最深。对于他们中间最脆弱、最不稳定的人陷于绝境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这种状况通过儿童和少年中精神失常形式的增多、青年犯罪率的增加、少年中自杀和自杀未遂数字可悲地上升而表现出来。以目前的形式出现的吸毒问题是所有的人，首先是青年人感到生活苦闷的一种反映，是这种状况的一个严重的、悲惨的和令人愤慨的表现。

* * *

人们有时会对我们如此重视我们社会危机的这一面而感到惊讶。有些人甚至用他们认为是自由和人类进步的先进立

场来指责我们。

因此，让我们说实话吧。我们是清教徒吗？我们主张把严厉的、宣扬禁欲主义和见人就害羞的道德规则强加于人吗？完全不是。毫无疑问，我们对生活的变迁、对风俗习惯和人的心理的变化比任何人都更为敏感。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恐，正如我们对个人在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方面存在差别也并不感到惊恐一样。我们党并不想对他们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进行干预，由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经验来决定。应该说，我在这点上始终对某些兜售所谓先进思想的文章感到吃惊（有点反感），有的人在这些文章中想把他们自己关于安排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方式的观点强加于人，尤其是强加给劳动者，而某些周刊却把登载这种文章作为自己的一项专长。这种做法未免有点简单化并具有专断的性质。我们对人们在安排自己生活方面的自由和抉择持有比那些人更为开放的观点；在这点上，我们认为宽容是尊重别人的一个条件。此外，我们认为共产党并没有解释和解决所有个人问题的使命。我们是一个政党，而个人的问题并不都属于政治范畴。

那么，这一立场是否因此使我们处于中立，并对我们社会危机的道德方面闭口不谈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对自己的责任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我们的人民进行战斗，那么，在所有这些企图阻止人民行动、将其诱入歧途，或反对人民团结的活动面前，我们又怎能袖手旁观呢？

这里涉及到我们所坚持的一点，即贯穿我们的理论和行

动的人道主义，否则我们就不能成为共产党人了。我们在阿尔让特伊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说得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完全科学的世界观的基础上；但它没有把它为理解现实所作的努力和它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改变现实的意志割裂开。”我们既然要对资本主义的惨无人道进行斗争，怎么能不同由暴力、狂热、色情、吸毒造成的这种非人道化的情况作斗争呢？总之，怎能不同这个社会在最后阶段采取的摧残人类的各种形式作斗争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不会向任何恫吓屈服，即使它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我们关心我国人民和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今天这是需要关心的问题，而明天这将是我们应该履行的义务。

疾病的症结

我在本章的开头就提出了问题：危机来自何方？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它来自这样的事实：以金融势力统治为特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显然已无法解决劳动者、我国人民和民族所面临的任何问题。

对国家的形势进行清醒、客观的研究表明，我们已显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形势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继续发展下去，也不能停留在目前境况或重新回到过去的状态。在我们已进入的阶段里，制度的问题、困难和矛盾已发展到必须给予全新回答的地步。

过去几年的事实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人们还记得，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在他的竞选运动中自封为“不冒险而

变革”的旗手。似乎有了他，就会消灭失业，降低物价上涨的幅度，提高生活水平，还有些什么？似乎法国在几个月内就会变成真正的天堂。最初宣称要过一百天才能看到变革的情况。限期到了，又要求五百天的期限。最后，三年多过去了，而我们也看到了事实。曾经提出“复兴计划”，以后又有希拉克的“重振计划”，希拉克宣称已走到“隧道的尽头”了。结果怎样呢？通货膨胀结束了吗？充分就业实现了吗？外贸收支平衡了吗？没有。巴尔先生来了；在严重的形势下，他制定了第一个计划，后来又有第二个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是第三个计划了。空头支票一张接着一张，部长们的脸上继续显露出满意的神色，而危机的恶果正在法国人中间扩展。

不论人们转向何方，都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问题，而归根结蒂，这些问题都出自同一个原因：国家的全部生活都服从于资本主义大公司牟取利润和扩张权势的目标。这是使法国窒息的枷锁，是使法国耗尽其体力的伤口。这就是疾病的症结。如果不从这个问题开刀，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相反，一切将继续恶化。

法国为摆脱危机所需要的是彻底改变方针，改变政策，改变社会。它需要的是对大资本的统治提出疑问，为民族生活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民主化开辟道路。变革，真正的变革，这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它是今天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

(3)

大家都在谈论变革。而你们共产党人提出什么样的变革呢？

我已经谈过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们的国家又是怎样在衰落。不能让这种巨大的不公正和可怕的混乱现象持续下去。必须使这种状况改变，真正地改变。

一项广泛的社会政策

“变革”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立即把各行业最低工资提高到同1977年四月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二千二百法郎，如各大工会组织所要求的那样，一般地说，要立即提高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这种提高是有差别的：那些领取各行业最低工资的人的购买力将提高百分之四十，而那些领取相当各行业最低工资四倍的人的购买力则不予提高。这样的增长率相当于工资总数每年增长百分之十。这不是过分的要求。工资的差距也将从目前一与十二之比变为一与九之比。这是合理的，因为今天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之间的差距太大。为了缩短这个差距，而又不

取消劳动质量(也包括劳动强度)的不同所产生的必要的工资差距,我们认为建立新的工资等级制度是必要的。经过与工会商议并建立在低工资往高提的基础上的工资幅度,在我们看来,最终应该是大约一与五之比。

变革,还意味着家庭补贴从第一年起增加百分之五十。

变革意味着,如果家庭中只有一人领工资,被解雇的劳动者的最低津贴要提高到各行业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二。对另一些失业者,特别是对那些开始找工作的青年,最低津贴应相当于各行业最低工资的百分之五十。

变革意味着立即把最低养老金提高到每月一千二百法郎,给成年残废的社会互助津贴也一样。

变革意味着采取有效措施反对通货膨胀;否则,物价上涨会迅速地吞食工资增长,而劳动者就会从这只手丢失从另一只手所取得的东西。

变革意味着真正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在生产部门每年提供五十万个工作岗位,在教育部门提供四万个,在医院提供二万个,等等。

这意味着每周工时缩减到四十个小时,而工资照付,普遍实行五周带薪假期。

这意味着降低退休年龄:男的为六十岁,女的五十五岁(包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而退休金照拿。

变革意味着禁止驱赶成千上万最贫困的家庭并强占其财物。

变革意味着治疗费的报销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住院费的报销提高到百分之一百;产假延长到十八个星期;妇幼保健的

费用增加一倍；医院平民化。

这意味着保证使所有享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免除学费、书杂费和交通费；立即建立五千个初级幼儿班和二百个托儿所。

这意味着侧重解决社会住房问题，自第一年起，在规定的预算以外，增建十万套低房租住宅，并稳定房租。

变革意味着保证外籍工人享有同样的社会权利和民主权利，尊重他们的尊严和民族风尚。

这也意味着认真地改善劳动条件，限制劳动强度，调整劳动时间，保证卫生和安全。特别紧迫的是要为那些被称为专业化工人的人出力，他们成年累月地从事琐碎单一的劳动；必须让他们调换工作岗位，向他们提供提高专业水平（并要反映在工资上）和不断得到培训的条件。更广泛地说，必须立即开始消除阻止每一个劳动者按他们的个人才能而晋升的一切障碍。

总之，变革意味着实行一项广泛的社会政策，一项能满足劳动家庭基本需要的政策。

改变政策而不是调换标签

这对象我们这样一个物资丰富的国家来说，是否要求过高呢？要求普通的家庭能正常地、象样地生活，摆脱每天遇到的困难、贫困和焦虑，这难道是任意抬价？不，这不是任意抬价，这仅仅是公平合理。

可是，怎样来实现这些社会目标呢？怎么使这一新的政策取胜呢？

是否只需调换一下政府官员就行了呢？三十年来，法国政府已经更换了许多次。所有的政治组织——除共产党以外——都相继执政。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政府，有联合政府，也有右翼或左翼的清一色政府。但有一点没有改变，即劳动者及其家庭的条件没有改变。此外，还有一点也没有改变，即大的私营公司的巨额利润不断增加。

是否可以这样说，只要调换一下标签、口号、名称就行了呢？英国的卡拉汉先生、西德的施密特先生都在谈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执行着一项同法国的巴尔和希拉克先生对劳动者一样残酷的失业、工资冻结和生活费用昂贵的政策。在那里同在这里一样，大垄断企业获利的情况都很好。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说实话，如果不拥有必要的手段，那就不可能贯彻法国群众所需要的社会政策。

而这些手段今天就已存在。但是，它们落入大资本家之手，落入大金融和大工业集团之手。

只要他们控制着国家主要经济命脉，任何真正、持久的社会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利用这些手段仅仅为了维护并增加他们的私利。

如果不废除他们行使的特权并消灭浪费现象，如果让他们根据自己利益的需要来掌握我国经济命脉的发展方向，如果不把国家的财富用来满足创造财富的人——即我们人民的需要，那么，任何真正改善劳动者及其家庭命运的社会政策都不可能得到贯彻。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目前在全国开展广泛讨论的真正目的；如果不坚决结束大工业和金融集团的绝对统治，要

在法国实现任何真正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国有化是变革的基本条件

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原因，经过我们党十三年的努力，于一九七二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把控制我国经济主要部门的银行、金融部门和九个工业集团国有化。我们认为必须在五年以后的今天，把那些根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雇主联合会属下的）冶金和石油部门内已实现多数人参与的企业改变为真正的国有化企业，还要增加囊其犹一雪铁龙企业的国有化。这不能算过分，大家都知道这些企业是靠公共资金来维持的。总共加在一起，我们所主张的国有化措施涉及一千四百五十个企业。

国有化，就是把这些集团的财产变为国家所有。社会党书记米歇尔·罗卡尔徒劳地声称：“占有（指所有制）正在成为无效”，这种专横的断言是错误的。谁占有，谁就有权作出决定。我们不是国有化的狂热分子。但是，使经济的主要部门成为国家集体所有，这正是变革的基本条件。因为这是最终使决定性的经济部门的活动朝着符合国家及其人民的需要，而不是符合少数人特殊利益的方向发展的唯一手段。

当权派、右翼人物——必须注意到，最近以来还包括社会党领导人，都说国有化的代价太大，而且是无成效的。

让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尽管现有的国家企业遭到私营的大公司和大银行的大规模掠夺，尽管政府在那里推行官僚主义，它们仍然表明了自己

的效能。只不过这种效能被转移了方向。它不是为国家服务，而是为私人垄断资本效劳。

从法国电力公司这一例子可以作出判断。

法国电力公司是欧洲发电量最大的企业，而它向工业部门索取的电价是所有共同体国家中最低的——比西德低百分之五十。国家迫使这个国家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佩希内、罗纳—普朗克及其它托拉斯集团供电。当这个企业被迫亏本向其最大的顾客出售电力的时候，根据同样的逻辑，它还必须高价向其供应者支付定货。例如这家法国电力公司必须遵照昂潘男爵的规定行事，我曾经说过，这个男爵在近四年内断然将核电站的价格提高了一倍。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法国电力公司在向全国正常供电方面遇到些困难，怎能不看到这些困难的产生正是由于当局可恶地利用这些尖端企业来为大资本家的利益服务。

我说“这些”企业，这是因为法国电力公司的情况同样在雷诺工厂、法国铁路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等企业里发生。

当然，在我们提议建立的扩大的和民主化的公共部门里的情况将完全不一样。

在民主的法国，公共企业的使命不是给垄断资本掠夺国家财富提供方便，而是依靠国家的财富，使之开花结果。

它们的目标、它们的任务不是向大资本的浪费提供资金，而是使其效能为国家利益服务，确保我国经济的一致性和活力，这种一致性和活力今天几乎不存在。

可以看到，民主的国有化完全是变革的一个基本条件。

有效的、民主化的公共部门

还必须实现三个条件：国有化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部分的；国有化必须涉及足够的范围；国有化必须是民主的。

首先，国有化必须是真正的国有化。事实上，如果把掌握多数股票和国有化说成是一码事，这是错误的。只须参照一下共同纲领就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措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只有真正的国有化才能排除大股东无疑会玩弄的手腕，如果他们仍然保持着企业的所有权。因此，只有国有化才能创造最好的条件，使公共部门朝着满足人民、地区和国家需要的方向发展。此外，也只有真正的国有化，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包括劳动者有得到情报、进行领导和监督的权利。不可能一面许诺资本家保持对企业的权力，另一面又保证工资收入者有权对企业进行管理，必须选择……

瑞典政府最近买了一个重要钢铁集团的百分之五十的股票。工业部长说什么呢？“我们不要国有化，我们只是要帮助工业解决其结构问题，使其能恢复原来的地位。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私人董事会手中……”

一句话，用掌握多数股票来代替国有化，这等于是由国家来管理一批股票而对劳动者没有任何保证，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国有化必须涉及足够的范围。这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在纲领里指名的九个集团，即所有的股权公司及由其控制多数股票的子公司总共有一千个企业，这是大家知道的。

如果再加上钢铁、石油以及褒其犹一雪铁龙企业——这已成为必要的了——新的公共部门将仅涉及法国企业的百分之一。这很少。但事实是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今天向大资本家提供了必要手段来影响国家经济命脉，使之仅仅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损害国家利益。正是为了使这些主要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才必须把这些集团国有化。共同纲领规定了要实现国有化的最低限度。拒绝这样做，也就是拒绝变革的手段。

其三，国有化必须是民主的。我们对所要实行的国有化的概念以及我们给它规定的作用，同今天的现实是完全不同的。

一方面，按我们看来，国家企业的管理必须是权力分散的和独立自主的。另一方面，劳动者必须享受新的权利，使他们能参与这些企业的领导和管理。所以，我们要求国家企业董事会应包括工人和用户某些阶层所推选的代表以及中央政权机构的代表（后者不能占多数）。此外，我们要求董事长应由董事会自由选举产生（而社会党却认为董事长事实上由政府指定。）

因此，人们可以了解，我们反对任何由国家来控制和“引导”的做法。今天，在国家资本主义统治下，这种观念却占了上风，而每个人都能看到它带来的一切恶果。

我们认为，恰恰相反，现代经济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者——全体劳动者，从专业化工人到工程师——在各自的生产部门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我们所主张的国有化真正能做到权力的广泛分散和对有关企业实行真正的民主管理。在这方面，国有化在全体劳动者为了扩大自己在企业

中的权利，在各级参与国家事务的领导和管理而进行的斗争中起着推动作用。

一个灵活、权力分散并用契约规定的规划

如果这样使大资产阶级失去其控制权，那么国家经济就会取得新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只要依靠国有化，就能够减少浪费，控制物价，制止通货膨胀；就有可能防止法国或外国大资产阶级在国家生产机构里进行投机。在已经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这一非凡的事业中，对我们来说，将不存在任何禁区。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放弃在核能发电、电子、信息和宇航等有前途的工业方面留下自己的印记。只有民主地、由工人和公民参加，而不是由技术官僚部门秘密制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按计划合理地调整强大的生产力。这个灵活、分散并用契约形式规定下来的规划，将使同中小企业和整个私营部门有关的规模宏大的工业纲领得以实现。

所有这些倡议和努力都将使生产再度增长，这种增长又为工资收入者购买力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市场的扩大所推动。我已经在去年十月十三日举行的国民议会上，以共产党党团小组的名义（任何一个反对党还从未这样做过）提出了可作为法国预算的详细预算，如果我们的建议能付诸实施，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生产增长率就可达到百分之六点八。这是能够达到的目标。我补充说一下，这种增长不是按照利润的要求，而是为了满足人民各方面的需要，因而是真正新型的增长。

新型的增长

我们这里的意思是否要更多地生产呢？是的，这是必要的；如果要结束数百万家庭的贫困和苦难，如果要解决吃饭、取暖、穿衣、住房以及看病、提高文化、抚育孩子等一切基本需要，那么，更多地生产是必要的。只有更多地生产，才能使富裕的生活取代紧缩节俭的生活。

但是否不管什么都生产，不管什么条件都生产呢？不！必须更多地生产；但是，由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私利，因而便有可能用另一种方式进行生产。例如，有可能改善产品质量，延长产品的寿命，同时减轻劳动负担。

但是，不止于此。当我们谈到新型的增长，我们也要说明，对我们来说，经济的努力不能出自短视的利己主义。必须一开始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给后代留下什么样的世界？盲目的“唯生产论”将遗留给他们一个难以生活的、不人道的世界。我们拒绝这样做。相反，我们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民主的方法——节约资源，保持均衡，保护并改善今天和未来的生活水平——来保护、开发大自然，并使之更加丰富，保护人类生活的环境。

“让富人付钱……”

即便说国有化是这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要方法

之一，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仅国有化是不够的。其它改革的方法也是必需的。

首先是税收政策的改革。建立在普通人所要求的公平合理基础上的改革，可用富有意义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让富人付钱”。

在这方面，也确实必须改变。因此我们提出一份新的税率表，它将使得将近二百万户穷困的家庭——特别是那些收入不超过我们所确定的各行业最低工资的家庭——免去一切所得税。另一方面，那些收入最高者交付的税收率可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这不是全部。对企业来说，要按公司资本的大小交纳一笔新的、巨额的现代税款。不是象一些国家所设想的、在法国有时也提出过的那种微不足道的财产税，而是高额的税收，它将促使企业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生产手段，更好地使用资本的开支。

我们认为同样有必要设立个人财产税，每户二百万新法郎以下的减免（至于个体企业，三百万以下的减免）。

最后，必须完全废除目前给大股东收入方面的税收优惠，并进行实际的斗争，反对逃税和舞弊。

我们知道，富有者对这些建议感到不满。那么，反过来，对社会党拒绝这些建议应怎么理解呢？说实话：不可能高谈阔论社会不平等，而同时却又拒绝能纠正这些不平等的措施。

新的农业政策

真正的变革也要求其它方面的改革。

例如，必须把保护农业看作是全国的要求。在我国，尊重农民所有制是维护农民的安全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条件之一。必须杜绝土地投机，使土地首先为农业经营者所支配，他们可以通过低息借贷的方式购买土地——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通过保证佃户安定和安全的租地条件和价格租地。

从这点出发，我们认为新的农业政策必须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来贯彻。

首先，必须保证家庭经营有适当的收入，并通过两方面的活动保证收入不断增长，即保证价格和所承担的生产费用相一致，降低生产费用。为此，必须建立保证最低价格——至少要保证一个家庭经营者产量的最低价格——并根据需要引导生产的市场组织。

其次，必须推动一项改善家庭经营生产条件的广泛政策，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并发展生产方面的自愿互助和合作。

第三，必须改善农民和农村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关于农户的社会保护、农村的集体设备以及公用事业，扩大农业各部门的就业。关于最后这一点，我们特别主张发展农村的食品工业。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也有利于维持农村人口。

人不能光靠面包维持生命

变革，首先要贯彻我刚才介绍了要点的新的社会、经济政策（我只提了这一政策的要点，因为我们的建议十分详细，涉及社会、经济各方面）。总之，变革，就是要生活得更好。

但是,人不能光靠面包维持生命。为了生活,他也需要自由和责任感——这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千百万男女越来越渴望民主。

民主、自由、责任感、首创精神,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需要。

只有进行社会变革,使民主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得到发展,才能为危机找到出路。

(4)

你们说：你们党的政策可用一个词概括：“民主”。
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不一定要共产党员才能注意到以下事实，即：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制度下，一切都是为了排斥公民参与国家事务。

所谓公民，首先是指劳动者。

他们创造着全部国民财富，他们是国家的有生力量，人们总是要求他们作出牺牲。他们在领导国家事务的管理工作、起草国家计划和确定自己的劳动条件方面，究竟有多大分量？现在的多数派——吉斯卡尔派、保卫共和联盟和中间派的议员中没有一个人。在多数派的部长中也没有一个人。

国家远离公民，但靠拢金融势力

诚然，法国人定期参加选举，议会通过选举建立起来了。

但是，举例说，有一项极不公正的选举法严重地损害着国

民议会的代表性。在一九七三年三月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以五百十五万六千张选票赢得七十三个议席，但保卫共和联盟却以五百七十八万八千张选票获得一百八十五个议席。由此可见，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代表数量不足。

此外，目前国民议会拥有的权力极有限。一切重要决定不是通过国民议会，而是由共和国总统一手包办。这种同法国共和传统格格不入的个人专权的情况正在不断地加剧。吉斯卡尔·德斯坦曾在竞选运动中声称，他打算加强他所谓的“总统倾向”。这是他唯一恪守的诺言：管理一个象法国这样的现代国家的事务，越来越变成一个人的“权限”。这是不民主的。其结果远未使国家的活动更加有效、更加有力，反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今天的危机状态。

地方议会的遭遇也不见得好些。这些年来，市议会的权力不断遭到削弱，经费被削减。

今天，国家作为统治者和专制者，远离公民，凌驾于公民之上。难道不这样吗？国家不是服从总的利益的需要，而仅仅服从私人工业和金融大集团的利益的需要。这已发展到如此程度，导致了如此多的丑事，以致国家干部、高级官员和行政官吏自己也感到愤慨。他们是、也愿意成为国家的公仆，但他们伤心地看到，人家把他们当作执行一项仅仅考虑获取大量私利的政策的奴仆。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为金融势力效劳而经常违法的制度下。

国家“根据你是有权有势，还是贫苦百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你。它关心少数特权者的要求，它本身患有各种投机活动、走后门和贪污腐化等溃疡病，但它对自己政策的无数受害

者所提出的要求却置若罔闻。

这样的国家至少是稳定而强大的国家吗？不，这个国家的政策同法国人的正当愿望之间的分离日益严重，因而使国家衰弱，无法摆脱自己的政策所造成的危机。建立在社会不公平基础上的国家，不会是强大的国家。

人们总是谈起同样的基本事实，即法国的制度的特点，是一小撮私人工业和金融集团掌握全部国家命脉。统治阶级竭力剥夺人民的一切干预和监督手段，逐渐地有步骤地侵蚀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以便在最好的条件下掠夺国家，毫不留情地剥削劳动者。垄断资本的集中越加剧，政治经济的权力也就越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集中、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化，是这一制度的显著特点。与此同时，劳动者、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受到排斥，无权对自己日常生活和劳动条件以及国家命运作出决定。决定是人家替他们作的，因为所作的决定是违反他们的利益的。

我前面讲过，就全国范围而言，劳动者在政府中没有地位，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权不足。但在社会生活的其它各级组织，劳动者也没有更多的发言权。今天，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对于直接涉及到他们日常生活方面的选择，完全没有可能进行干预。在只有考虑到人民自己通过协商和讨论提出的要求，并且征求大量分散的倡议，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市政规划、集体设施和生活环境等复杂问题的时代里，这种情况是十分荒谬的。在企业里，人们不征求劳动者的意见；劳动者被看作机器的部件、在老板的计划上任人挪动的小卒。这是对劳动者能力的戕害，而在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要求企业的各类劳动

者发挥其创造性和主动性的时代里，这同样是十分荒谬的。

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民主，它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的推进，不仅是社会公平的一项要求，而且是推动经济蓬勃发展和提高效率、改善劳动者家庭的生活条件，并使国家恢复被一些象奸商一样为非作歹的政客们所糟蹋的活动自由的唯一手段。

假如劳动者在企业经营和国家管理方面有权发表意见，那么，他们是否会听凭工厂关闭？今天是否会出现一百五十万失业者呢？假如劳动妇女有权发表意见，那么，她们在工资收入和选择职业方面遭到的歧视，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呢？假如农民有权发表意见，那么，法国的农业是否会象今天那样的糟糕呢？当然不会那样！只有一种办法来执行为劳动者服务的政策，那就是必须由劳动者自己来执行这种政策，即让劳动者领导国家。这是民主的要求。因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他们是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

民主是基本的需要

因此，今天列入人民斗争议事日程的问题，就是民主。

社会民主：要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真正享受其劳动成果；必须结束对劳动者的不公平做法和歧视；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每人得到能保证象样地生活的收入；由于保证每人都享有受教育和接受高等培训的权利，大家都能担任负责工作。

经济民主：操纵国计民生的银行集团和工业垄断资本不

该是属于一小撮利己主义者的私有财产，应当成为国家的财产。必须使劳动者参与经济决定，特别是参与管理那些国有化的企业和制订规划。

政治民主：要让公民、全体公民都能真正地进行选择、决定、监督和管理。特别是要让劳动者在企业、地方、地区和政府内部，在各级参与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这种经济、社会和政治民主，即现代民主，今天已成为劳动者的基本需要，法国人民的基本需要。

我还要说明，在我们看来，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我们的斗争是为了建立一个每人都掌握自己命运和发展自己个性的社会，一个自由、负责和推行参与制的社会，创造使人的存在意义更加丰富的全部条件。对于我们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这是一场阶级搏斗，是工人阶级开展的斗争，他们迫切需要反对大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大资产阶级已无法继续容忍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基本上被剥夺了自由，因为它的劳动归他人所有，归资本主义所有；因为它身受剥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恶果之害：令人疲惫不堪的劳动强度，没有可能选择职业，个性的窒息。剥削越是扩展到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也就越少，并失去阵地。

因此，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对于号召消灭大资本剥削和压迫的政党来说，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根本性的行动。

在修订共同纲领的谈判中，唯独我们党提出了很多新的大胆建议，以期在明天的法国真正地推进民主，这决非

偶然。

让民主进入企业

今天,民主留在企业大门之外。企业内部专制主义盛行,而只有劳动者的行动能对它有所约束。只要企业内部实行君主制,社会上就不可能是共和制。让民主进入企业,这是当代的一大要求、一大新事物。

因此,必须扩大一切企业的劳动者的权利。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自由,我们提出的新的劳动法规定了一些明确的措施,保障每个工资收入者享有切实的思想、言论自由和(工会与政治)组织自由。老板在解雇工人、关闭工厂方面的专断权,反罢工的措施,都将予以取消。

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安全,职工代表和卫生、安全委员会将有权使一切对劳动者造成威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系统停止运转。

为了保障劳动者取得情报并实行监督,凡涉及企业活动,以及工作人员劳动条件和报酬的一切重要决定,必须事先向企业委员会通报并与之协商。委员会将拥有同劳动者协商所必要的手段,尤其是每月占劳动时间一小时,工资照付。必须确认委员会在招工、解雇和劳动条件方面拥有使决定暂停执行的上诉权。

同时,必须扩大企业工会组织的权利并增加经费。工会组织应有可能每月召集职工开一次会,占劳动时间一小时,工资照付。

理所当然，在国有化的公共部门企业里，将有可能和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多，并在各级付诸实施。

在“基层”一级：建立权力分散的机构，例如，建立车间委员会或科室委员会（法国民主工联提出的这一主张是不错的），使有关的职工得以在劳动条件、劳动组织和工作内容方面直接进行干预。

在企业委员会一级：委员会由一名职工代表主持，主要是参与制订有关劳动条件、劳动者培训和报酬的一切集体措施。

在董事会一级：董事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成员应由按比例代表制选出的职工代表组成，董事会通过自由选举产生董事长，它将保证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甚至企业领导。

这样，国有化企业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建立新的民主的生产和管理机构方面，都将发挥先导作用。

自治

显而易见，企业生活的民主化应伴随国民经济运转方面的重大变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建议，根据何在？十年来，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运转、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象法国这样一个国家的条件和需要等问题，我们考虑得很多。我们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着过分的集中和官僚主义化，产生着一种制度所特有的等级和指挥方法，在那种制度下，少数人指挥一切，而广大劳动者的作用却局限于执行命令。然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国家政权中进行的变革，

是不足以清除这些弊病的。它们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甚至在社会主义所建立的新的经济基础上死灰复燃。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对于我们来说，不能试图用另一些特权者来代替今天的特权者，用一种官僚主义来代替另一种官僚主义，用左翼技术官僚来代替右翼技术官僚。这样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法国建立不了社会主义。我们的前景基于下述观点，即增加和更加公平地分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不断地扩大职责、在更大程度上将权力分散以及同自治是不可分割的。

因此，我们认为，国营企业应当拥有广泛的管理自主权。我们也认为，不要让计划去指挥、支配和确定经济生活的微小细节，而要在劳动者和人民群众的参与下，民主地制定计划，使计划能发挥推动、协调和调整相当分散的经济的作用。例如，这一观念促使我们建议使用谈判合同的方法处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要求取消一切无用的行政管制和一切预先的财政监督，并主张对财政机构进行改革，使企业财权分散和脱离国家的控制。

* * *

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关联的：没有新的、生动而活跃的政治民主，企业民主和经济民主是不可思议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引述我们在十一月提交法国民主工联和其他工会组织的声明中的几段话，来说清楚我们的看法：

“我们要求公民行使权力。”

“必须扭转下述的历史性演变：政治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优秀’的‘专家’手中，他们用国家这个统治机器来为某一阶

级服务”。

“必须结束任何脱离公民的权力形式，并且使决策中心尽可能接近与之有关的人；通过让有关的人自己作出决定，并使国家仅仅处理真正全国性的问题的办法，来清除官僚主义的恶习，并解决一切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

“必须考虑到我国特有的民主成果，使国家本身民主化。”

“必须发展结社生活，来促进公民对各级国家机关的事务提出倡议并进行干预。”

“总之，必须否定等级和专断的原则，即使它披着‘国家利益’的外衣；摒弃任何专制主义，即使它采取‘开明’的形式。”

“这就是我们向联合成大多数的我国人民建议创建的一种崭新的政治生活。”

市镇民主

上述原则适用于各级组织的政治生活，首先适用于市镇或村镇一级。

市镇是各种问题都能得以处理的基层一级。实际上，市镇的职权应该扩大到涉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不仅是就业、住房、社会和文化设施、服务行业问题，而且涉及集体生活的一切基本内容。

这意味着市镇应发挥更大作用，拥有与完成其任务相适应的手段，以及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真正的自主权。例如，在地方设施的规划中，市镇有赞同和不赞同的自由。

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因为国家将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

中，变成“鞭子老头”^①或“公民的保护人”，并非是件好事，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尤其是这样。问题和要求极不相同，不能万事由上面解决。

因此，我们建议，市议会要根据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体现出人民中存在的各种政治倾向的代表性。

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希望议员们能经常同人民对话，在作出重要决定之前把情况告诉他们，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为这是民主的、有效的做法。

我们认为，同广大公民协商不仅可以在政治选举和职业选举中组织进行，也可以通过更多地召开人民协商委员会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共产党人领导的城市在这方面已取得有益的经验）。

我重申，民主同效率并不矛盾。相反，辩论越公开、越广泛，意见就发表得越多，在某个具体方面所要实现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就能更好地得以确定。正确贯彻一项决定的前提是：这项决定首先必须是在有关的人参与的情况下作出，而且他们需拥有必要手段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协作关系也将随着地方企业的建立而形成。在市镇地区内存在和活动的各种各样的协会也将如此，但在协作中必须严格尊重其独立。负责地方团体和劳动者之间联系的组织，如地方就业委员会等，将为新的力量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开辟道路。

要充分并有效地履行职责，市镇和市镇议会就必须拥有

^① 用来吓小孩的传说中的怪物。——译者

真正的自治权。这将是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新事物。凡涉及地方利益的建设项目，市镇的创议将纳入灵活而非强制性的规划。这种规划绝对不能限制市镇的自治。必须保障市镇自治管理，并且要真正地做到。市镇自治管理是我们活动的基础之一，是我们不断扩大民主的政策的基础之一。

地区民主

民主要求处于中央和地方机构之间的中层一级的实际存在和良好运转。地区可以并应该成为旨在真正做到权力分散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级。真正的地区民主，远不危及国家的统一，而是使法国保持平衡的强大因素和使民族文化各组成部分得以繁荣发展的支柱。

我们并不因此而使地区和省对立起来。如果为了支持一方面而去否定另一方面，这等于是调整目前的集中制。而我们要求的是一种真正的地方分权。

因此，我们主张建立真正的地区议会，这就是说，地区议会应通过普选和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拥有今天属于省长的权力和财政手段，和一个在议会内部选举产生的政府。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区能够在民主规划中发挥一种首要作用。因为只有地区一级，全面的社会需要才能始终如一地、最好地表达出来。为此，地区将参与制定和执行自己发展的方针。最后，地区是制定其文化政策的理想场所。不过，纵然地区议会的存在对于结束使我们今天感到窒息的集中制是完全必要的，但它本身还不足以保证地区一级社会关系的深

刻民主化。

因此，我们建议要有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同地区议会紧密配合。这意味着什么呢？必须使这一机构真正能够保证人民最广泛的参与，并使劳动者在选择地区政策的重大方针时，进行干预。总之，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在地区一级发挥作用的各组织、机构和协会经常进行协商的专用场地。

为了履行这一职责，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需要真正地反映地区的社会生活。为此，它应当由三个不同的小组组成：社会职业小组（每个有代表性的组织将指派代表参加），经济小组（包括地区经济界和企业委员会的代表），社会文化小组（包括地区文化机构和团体的代表）。地区议会在决定一切问题时，必须征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委员会的意见。

这样，民主的地区不仅将成为一种进行协调和提出建议的一级机构，而且成为在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一切问题上拥有自治管理权的决策机构。

全国范围的民主

但是，所有这些还不够，因为国家本身还有些大事。必须使国家事务不受工商界的控制。政权必须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和劳动者被排斥在国家领导之外，这对法国和法国人来说是一种不幸。现在是时候了，他们必须在国家事务方面承担自己的全部责任，在议会和政府内部取得自己的地位。这是今天真正的政治民主的重大需要。

真正的政治民主要求各级都按比例代表制进行选举。这是保证各种政治倾向和各社会阶层的意见被听取并按自己影响的大小参与国家事务。

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要求确认作为人民意志代表的国民议会拥有真正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和手段。

真正的政治民主要求取消或修改宪法中有关共和国总统拥有特别权力的条款。制定和执行普选中表现出来的大多数人民所渴望的政策，这是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权力。

政府活动的新概念

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要求对政府活动有一个新的概念。我想在这里谈谈这个问题，因为经常有人对我们在这问题上的意图产生疑问。

众所周知，我们主张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因为我们认为，实行法国的民主复兴、使国家摆脱危机、完成我国社会所需要的深刻变革，这不可能是一个党（即使是我们党也罢）的任务。这些变革要求一切可以参与的工人力量、民主力量和民族力量进行合作、结盟和联合。此外，我们并不认为，任何一个党单独执政会对我国有利。这样做对民主的危险太大。

因此，联合政府组成的基础应当是围绕共同纲领联合起来的政治组织各自在选举中体现出来的力量。此外，政府的结构和运转方式，应当根据这些组织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均等的原则，根据政府中领导成员权力平等，根据政府的团结和统

一来考虑。

总理的基本职责是领导和推动政府的工作。部长们将根据宪法规定,不再受共和国总统府行政机构的监护;他们将在各自的全部职权范围内和部际合作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职权。

我们并没有打乱政府(和行政)机构的意图。我们只是认为,根据我们的看法,政府机构应该适应执行政府行动纲领的重大方针的要求。在我们看来,这些方针应该将社会进步、掌握经济发展、保障民族独立、扩大和改善法国对外关系等放在首位。这个想法结束了过去存在的“高级”部和“二等”部之间的差别。既然要使真正创新、变革的政府政策行之有效,我们认为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建立一个独立于财政部、负责制定和执行(中期和长期)经济、社会计划和政策的部,在我们看来是特别必要的。该部将负责指导和协调工农业政策、地区规划和社会规划。当然,它将拥有完成其使命的手段。

鉴于要从事的活动对于发展市镇和地区民主的重要意义,也必须建立一个不同于内政部的、负责行政改革和地方行政单位改革的部。

为了在最短时期内着手进行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我们所设想的民主政府将充分依赖现有的行政机构和全体国家官员和工作人员。民主政府将严格实行政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注意维护政府和行政机构活动的纯洁性。

根据这一观点,必须迅速使公职人员参与行政管理,保障

他们的思想、言论和政治活动的自由。公职人员的职业管理将由双方共同承担，从而排除任何报复性的、偏爱或歧视行为。

最后，根据我们的看法，民主政府必须经常注意使劳动者和各人民阶层参与政府活动。所以在社会保险、公务、司法和自由等重大问题上，将组织由政府代表、议会代表和有关的社会各界和职业界的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因此应立即有步骤地进行谈判，特别是同职工工会和组织进行谈判。

可以看到，上述各级的民主化和权力分散是我们关注的大问题。

自由的时代

民主的如此发展，显然要求尊重、保障和扩大个人自由和集体自由。

我们坚决要尊重并使大家尊重思想和言论自由，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政治党派（包括反对党）的行动自由，创作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司法的独立性，结社和工会行动的自由（包括罢工自由）。所有这些自由不但要得到保证，而且还要加以扩大。

在保护个人方面，也应当如此。因此，法国的公民与那么多的国家、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不同，一直没有“人身保护法”——按该法规定，一切被追究的人在判决前都被看作无辜的——这个基本保障，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的纲领明确规定要建立这一制度，并且另一方面还要取消软禁、现行刑事诉讼法、省长的司法警察权。

必须取消现在损害公民自由的法律，并通过保护公民自由的法律。目前一些侵犯个人私生活的做法是不能容许的。例如，我看到有人窃听电话。这种做法必须禁止。此外，现在偷偷地、缓慢地采取了一些旨在真正对人民进行“分区控制”的做法；我指的是，由于电子计算机能集中各种各样的资料，不再对公民建立卡片档案。法律应该保护公民免遭这种“书信检查处”的现代方式的危害。

在我们看来，问题不在于一般的发表政见。因为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起草和通过一项关于权利和自由的声明，这项声明将列入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的开头部分，并提出我国目前可行的权利和自由，在过去历次战斗中已经宣告过的权利和自由，以及一系列符合当代需要和可能的新的自由所赖以建立的总原则。对于一切支持自由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声明将是宝贵的支柱和可靠的依据。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的几点意见

在这方面，必须回溯一个问题，即“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有人硬说，我们借口某些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或形式的自由而加以反对。这种说法既歪曲我们的立场，也歪曲我们理论缔造者的立场。

共产党人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反对一种自由，即剥削劳动者的自由；他们的全部战斗就是为了消灭这种自由。如果压迫的权利能称得上自由的话，那么，这就是唯一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

除此之外，我们绝对不把任何自由算在资产阶级的账上。诚然，法国资产阶级在近二百年前执政时，就在生活中引进了资产阶级哲学家所鼓吹的某些民主原则。但它早已迅速地将阐述和实行这些民主原则限制在适应其剥削阶级的阶级本性和需要的范围之内。

事实上，在法国，没有一项自由不是通过人民的痛苦和斗争，有时则以鲜血为代价赢得的。是的，劳动者和人民群众不得不为了实行普选，为了思想、言论、结社和出版自由，为了罢工权利、工会权利和拥有自己政党等权利而斗争。他们进行了斗争，因为所有这些自由都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这就是他们所以坚持这些自由，法国共产党所以始终不渝地珍视这些自由的原因。法国共产党在其全部历史中从未企图打击过任何自由。与此相反，它遭到过镇压，有时则是严厉的镇压，其中包括一些自称左翼政府的镇压。任何时候，它都有证明自己忠于自由事业的最崇高的证据。共产党人是在法国为自由经历了千百年斗争的全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普通公民或政治家的继承人，他们希望能进一步当好继承人。

多少年来，政权和制度中存在着限制自由、逐渐蚕食自由，并使其失去实际内容的倾向，因为这种政权和制度的基本动力是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特权。然而，自由是特权的敌人。因此，这种政权认为，自由只是用来当作公共建筑物大门上的装饰品。

现在正是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进行变革的时候了；是恢复一七八九年宣告的伟大原则，并使之成为活生生现实的时候了；也是修改这些伟大原则，为自由的新飞跃创造条件的时

候了。这是我们的愿望。

自由不能够也不应该仅仅是一边喝牛奶咖啡，一边“抗议”的权利。我们对自由有着无比崇高和丰富的概念。自由，就是使每个人都有可能充分获得发展，根据自己的爱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创造能力、才华和个性，对自己的企业和国家的生活切实进行干预，但这一切将在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兄弟般友爱的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实现。这种充分、完整的自由只有在取消少数人的特权，使之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这便是人类进步的道路。

海外省和海外领地也要自由

我们不能要求本国人民享有自由，而拒绝给其它民族以自由。在这方面，不能无视“海外省”和“海外领地”人民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权利要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个民主政府必须毫不含糊地和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些省和领地人民的自决权。因此，民主政府应该容许他们选举产生真正有代表性的议会，并且由议会来确定新的地位。当然，它将事先保证实施自由和民主权利。今天，海外省和海外领地人民仍被剥夺了自由和民主权利，而这种自由和权利对他们自由、独立自主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坚决支持海外省和海外领地的组织公开提出的要求：争取由本国人民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保障本国经济协调地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人民民主自治。这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演变和地位，绝不意味着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同法国

断绝关系。相反，它们是为有关地区人民的利益确立一种建立在新的合理基础上的、巩固的、互相信任的关系的手段。

* * *

可以看到，我们信任我国人民的才能和责任感，因而坚决地将我们的全部活动都置于由公民们自己日益广泛地管理整个社会的前景之中。这就叫做自治管理。这是民主的又一种说法。

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怕与任何人竞争。相反，我们向一切政治力量（我说明，毫无例外地向一切政治力量）进行挑战，民主的挑战。

(5)

你为什么如此始终不渝地酷爱民族独立？难道这不会使法国陷于孤立吗？

大多数政党，不管属于右翼还是左翼，如今都把民族独立当作儿戏。它们的领导人说，这已是过时的概念和现实，而现在是取消边界的时候了，应该考虑“欧洲”或“超越大西洋”的问题了，应该当个“世界主义者”，应该把我们的一部分主权交给“超国家”机构……

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和他的多数派已经采取行动，他们的政策严重地损害了法国的独立和主权。

我们的观点与此迥然不同。

至于我们，我们要一个强大、独立、自主的法国，同时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执行广泛国际合作政策的法国。这也是必要变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确实对此给予极大重视。

法国不再是其资源的主人

当我们讲到一个强大的法国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

作为其资源的主人的法国。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从经济和科技方面来说，接连地放弃主权。例如两年前政府把原子能专署的研究设备交给美国威斯汀豪斯财团和昂潘男爵使用，这是通过（国家—私人）合营的一家分公司进行的，今天有人还在向我们吹嘘其功绩。又例如法国国际电子计算机公司被卖给了美国霍尼韦尔·布尔托拉斯，使法国电子计算机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加工部门，把大批从事尖端研究的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排斥在一边。

还有其它依赖外国的例子，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尤其在能源、航空、造船工业方面。

我国许多部门一半以上的需要依赖外国，如机床、工业设备、家用设备、化纤、针织和制鞋等工业。

一般说来，我国外贸出现巨额赤字。而赤字又加强了我们对最发达、最强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依赖。

法国工业实力的基础逐渐地因此而削弱，而外国，特别是美国和联邦德国从中得益。这种演变由于下述事实而变得更为严重，即：法国的大公司关闭工厂，把机器扔到废铁堆里，使劳动者失业，同时它们却把资本输出国外，进行惊人的金融投机。我在上一章里已提到罗纳—普朗克公司，它把在法国的佩阿热—德—鲁西荣工厂关闭，同时却在巴西、西德或其它地方投资。我还能举出于齐诺尔这个例子，它把在法国的工厂关闭，把工人解雇，与此同时，却在美煤炭工业投资六百多亿法郎。还有埃尔诺—索米阿，它促使法国机床部门解体，相

反它在美国的工厂的营业额同期内却翻了一番，它扩大了在印度的经营，还在西班牙、北非和以色列开设了分公司。还有米歇兰公司、电力总公司、佩希奈—于齐诺尔—居尔芒、布苏瓦—苏雄—纳弗塞尔公司，它们也都这样做。

在此期间，法国货币持续地疲软。一九七六年法郎事实上贬值了百分之十。同马克相比，如今它贬值了百分之二十。

吉斯卡尔政权接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全部统治，同意放弃金本位和固定比价。我国创纪录的负债额（据《回声报》称，高达一千二百多亿法郎）加剧了我国货币所受的威胁。

必须指出，政府的这种政策缓慢地，但无情地破坏着我国独立的基础。民族发展的未来也因此受到损害。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存在同样的情况。

国家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一个独立自主的法国，是一个主宰自己国防、对外和对内政策的法国。它要使本国人民的权利，象各国人民的权利一样得到尊重，由自己来决定适合本国人民的社会制度。

然而，吉斯卡尔·德斯坦从他执政以来作了些什么呢？

他的政府的第一个外交行动就是赶忙在渥太华宣言上签字，把我国进一步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他偷偷摸摸地、悄悄地把我国重新纳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放弃了必须保证法国拥有“全方位”防务的戴高乐的军事战略。同时他竭力鼓吹

欧洲政治联合，而这一联合的实现将意味着我国被纳入一个联合体，并象人失去血液一样地渐渐丧失自己的主权和自由……吉斯卡尔政权就是千方百计地利用普选来赋予欧洲议会新权力，并削弱本国议会的权力。如果这一有害的计划得以实施，那么有关法国和法国人以及他们的生命和前途的重大决策将由一个外国的官僚机构强加于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党开展的斗争才避免了上述情况的发生。吉斯卡尔·德斯坦之流并不因此而放松他们为建立一个托拉斯小欧洲的政治联合而进行的活动，他们为了小欧洲的利益，声称准备放弃一些国家主权。应该说，不幸的是社会党对欧洲联合的热忱与吉斯卡尔的计划相呼应。

由于在这新的神圣同盟里西德显然将处于压倒优势地位，这一方针就变得越发危险。西德已成为经济和金融的巨人，有着明显的扩张野心。它的军事力量十分雄厚，它拥有西欧最强大的军队，它只缺乏在核武器方面的充分自由。在这种形势下，吉斯卡尔的政策把这个占支配地位的专制的德国作为我国的特殊盟友，甚至屈辱到取消庆祝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纳粹德国失败纪念日的地步，这一政策为法国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危险。当政府和它的多数派把他们称之为“前沿战”的理论作为新的军事理论时，人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这种理论事实上将导致下述结果，即当一场与法国利益毫不相干的冲突爆发时，我国的武装力量将交给联邦国防军去支配。

任何关心民族利益和安全的法国人，都不会接受旨在使法国成为西德野心的台阶的政策。

让我国人民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愿意毫无歧视地同所有国家，当然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在尊重各自独立和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最广泛合作。在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人员往来，彼此也都不愿损害这种联系。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紧张局势，我们不要在莱茵河上的敌意。我们要安全、和睦和合作。我们两国人民三十年来已走了很长路程。使今后不再象过去那样的条件是存在的。要使我们边界上永远不再发生风暴，必须使欧洲，整个欧洲得到安宁；必须使两个德国和平地生存和发展。我们要莱茵河上的和平！我们要易北河上的和平！

然而，为了和睦相处，必须相互了解。我这样说是因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人有时指示我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例如，他们一想到法国政府里可能有共产党人参加就不高兴。确实，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们应该懂得法国的政策、法国政府的组成，这是法国人民的事情，也仅仅是法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至于我们，我们对联邦德国没有任何恶意，也丝毫没有干涉其事务的企图。应由德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来选择他们所要的领导人。我们的邻邦也应对法国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要求人们对我国尊重，让我国人民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象谚语所说：“即使烧炭人在自己家里也是主人。”每个人应该清楚地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对我们反对对我国事务进行任何干涉、任何干预、

施加任何外来压力——不管其来自何方——的意愿没有丝毫怀疑。

确保我国独立的基础

法国共产党忠于自己的传统，现在和将来都不遗余力地维护法国的独立和主权，即法国人民自由行动并进行有效的国际活动的手段。民族独立并非过时的概念，而是我们时代的伟大要求。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和巩固这一独立是当代世界的一项议题。再也没有比争取法国的独立、主权和发展的斗争更具有现实的、现代意义了。这是我们党二十二大的主导思想之一；我们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启示下提出了关于民主政府纲领的建议。

民族独立，这首先是执行法国重大政策的条件，也是保证社会和经济进步的条件。在目前形势下，为了摆脱多国公司的控制，确保我国经济独立，也即掌握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是实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及最近五年的现实生活已表明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的民主国有化。

我只举一个例子：石油。在这方面，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正是极需保证我们的独立，在这具体情况下也即保证我们石油供应独立（和安全）的时刻了。当前，正如我在电视广播中同富尔卡德辩论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国只得听命于盎格鲁—撒克逊石油大企业并被它们敲诈，最近卡特总统本人也揭露了这些企业的丑恶行径。这些公司从产油国买进石油，然后通过其子公司以高价卖给法国。我补充一点，它们以这

种方式向我们提供的石油大部分来自一个国家——沙特阿拉伯，我们不得不几乎全部以美元而不能以商品来支付。

怎样避免那种既加深我国经济的依赖性又增加我国外贸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呢？这要通过民主国有化，更具体地说通过对法国石油公司的国有化来实现。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把埃索石油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或英国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统统赶出法国呢？不，绝不是这样。但将不是它们的总公司按照它们所提的条件来供应它们所要的石油。而将由国营公司独立自主地负责这项工作。

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石油供应有多方面的来源，可以设法签定国与国之间的长期合同，同那些愿意以法国产品换取它们石油、在互利基础上同我们发展合作的产油国打交道。

这一例子，与其它许多例子一样，都证明了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即：民主国有化是在争取法国经济独立斗争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而这种独立本身则是执行重大社会政策的条件。

确保法国的安全

其次，民族独立是保证我国安全的条件。

法国有着决心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自豪和勇敢的人民。他们有权期待那些将把国家引上民主道路的领导人明确地表明法国安全独立地走自己道路的政治意愿。他们也有权要求国家拥有自卫手段。这就是法国共产党的愿望。这些防务手

段现在和将来都是政治性的，即人民当家作主，执行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和合作的政策等等。而在目前条件下，当我们为之而斗争的普遍、有监督的裁军还没有实现之前，这些防务手段必然也是军事性的。

民主法国的国防这一问题，今天与一九七一年中央委员会通过我们党施政纲领《改变航向》，或一九七二年我们签订共同纲领时的提法不同了。我国的常规武装力量的情况明显地恶化了。今天它已不能独立有效地保证全国各个组成部分的防务。难道我们能同意民主法国被剥夺国防吗？难道我们能赞成一些左翼人士所提出的要我国实现单方面裁军、致使我国冒各种外来压力和干涉的危险吗？不要指望我们会采取那种放弃独立的立场。

核武装问题

鉴于以上情况，中央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细致的研究，主张保持核武装。

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原来并不主张设置核武装。我们曾经反对为设置和发展核武装而迫使人民群众及常规部队本身作出牺牲。

我们丝毫不否定我们过去在反对核武装的斗争中所说过和做过的一切。曾经和我们共同战斗过的所有的人为维护和平作出了贡献，他们完全可以为此而感到自豪。然而，与一切反对核武装的人们的意愿相反，一种新形势出现了。

今天，核武装不仅存在着，而且由于人们对它绝对的重视而成了国家当前和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唯一有效的防务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单方面放弃核武装，就等于放弃一切真正的国家防务。这样的决定将会被看作是左翼联盟政府在维护法国独立方面的一种软弱表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不管其如何复杂，象我们这样一个负责的大党是不能回避的。也不能等到一九七八年大选之后再去进行研究。我们一贯认为，法国人完全应该对一切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毫不动摇地坚持这条行动路线。

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决定的性质。对吉斯卡尔政权来说，核武器是大西洋体系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巴尔先生说，“例如”在印度洋也可以使用核武器；这表明，核武器也是针对那些拒绝屈从于新殖民主义意愿的国家的。而我们则认为，核武器应该仅仅是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面前保障国家安全的一种威慑手段。因而，它应该是“全向”的。

我们决定的深刻政治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只是希望，今后任何国家都丝毫不要怀疑我们将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保卫我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我国人民和平劳动的安全的意志。

我们赞成缓和与裁军

为此，不需要使核武器超过当前规定的发展阶段。我们

断然反对把我国拖入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军备竞赛之中。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现实，这并不是为了使自己满足起来。相反，我们将进行不懈努力，要求一切有关国家通过谈判采取限制、裁减，最后销毁一切武器的措施。因此，我们在决定把法国核武器维持在我国安全所要求的水平上的同时，就法国在裁军、在对大家都同样安全的均衡条件下实现军事缓和方面采取具体的主动行动提出新的建议。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达到上述目标的条件今天是具备的。这是人类历史的幸运。我们认为，法国应该不遗余力地促成这一伟大计划的实现，而不是在被现政权拖进的冒险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确，我们要全力以赴地走向彻底销毁一切可怕的武器，争取实现全面、普遍、有监督的裁军。我们不要战争和战争威胁，不要敌对和猜疑。我们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明天，民主的法国将为谋求和平和裁军而采取必要的主动行动并表现出蓬勃的朝气，从而出色地担负起自己的使命，并使我国在世界上重新享有权威和威望。

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军事缓和与裁军方面提出的新建议。

美苏双方签订了一项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议。这是一项旨在防止爆发一场核冲突的好协议。我们认为，法国应该宣布参加这项协议。

美苏之间正在就限制战略核武器进行谈判。我们认为，法国应该要求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这一谈判。

我们反对集团政策

这两个建议与其它建议一样，清楚表明了我们希望法国奉行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我们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应由两个超级大国或由现有的两大集团来解决世界事务的思想。我们愿意维持法国的联盟关系、包括北大西洋联盟，但要使我国放弃自己的行动自由，跟在一个外国头目的后面——不管他是谁，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使法国用自己的声音讲话。应该结束集团政策，消除那种站在美国集团一边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身上，坦率地说也在社会党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我们对美国人民只有友谊，我们丝毫不想把美国当作敌人。正如法国共产党在美国革命二百周年时所指出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两国人民曾多次为了保卫自由和独立而并肩战斗。我们完全了解美国人民的活力和创造精神。我们要维护、丰富并进一步发展我们两个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这就要求尊重我们两国人民完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神圣权利。这也要求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严格尊重各自的独立、权利均等和各自的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我们主张法国同美国以及同世界上——东方或西方的——一切国家保持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我们指出：法国的政策既不应该在华盛顿，也不应该在莫斯科，或布鲁塞尔制定，它是在巴黎，在法国的首都，而不是在任何其它地方制定的！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民主的政府在维持其联盟关系的同时，应该迅速把国家引上对任何政治军事集团保持独立的道路上来。我们是指对任何集团，因为我们绝没有这样的打算，即使国家摆脱大西洋集团的禁锢而又使它纳入华沙条约的轨道。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替换办法。法国的利益所在是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保障真正的民族防务，并通过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例如同一切有同样愿望的国家签订互不诉诸武力、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来保障法国的安全，为实现裁军和集体安全作出有效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将重新获得巨大的权威和影响。

我们希望发展合作

这样的政策是否会使法国陷于孤立、与世隔绝而闭关自守呢？恰恰相反。

在我们这个时代，象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实行闭关自守，傲慢地与世隔绝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法国需要同尽可能多的国家发展多方面的、往往是紧密的关系。这对法国经济发展、对它的影响的扩大以及自身安全都是必要的。而今天，正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反动的对外政策以及它的集团政策，我国国际关系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它无法利用对我国人民有利的合作条件。相反，法国一旦重新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在这方面存在很多有利条件。未来的民主政府应该加以

利用。只要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反对歧视和谋求互利的基础之上,法国就会有可能会不仅扩大自己同外国的各种交流,而且还会使这种交流多样化,使它同其它国家进行合作,包括在生产某些产品方面的合作。这样,一个需要弥补的巨大缺陷就可以迅速地得到弥补。

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范围内可以这样做。在其内部业已建立的紧密关系可以作为同共同体中一个或几个伙伴一起实现工业、技术和科学合作计划的基础。

同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以及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这样做。就后一方面来说,我们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意大利等国相比,是大大落后的。

同发展中国家可以这样做。在这方面,如果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自愿商定的、排除任何新殖民主义思想和任何政治条件的关系,将能使法国同非洲、亚洲、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广泛地发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最后法国也将能积极地满足阿尔及利亚提出关于在我们两国间建立一种特殊合作关系的的要求,而这是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

争取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

这样,我国就会对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和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作出重大贡献。这种国际关系不再是建立在强权政治和疯狂追求私人垄断资本利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之上。这种稳定的、有计划的国际关系符合当代人类的需要,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地球上的

资源以及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所提供的条件。

* * *

由此可见，民族独立和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必要的变革、振兴和进步的绝对条件。

(6)

你有时谈到左翼联盟，有时谈到法兰西人民联盟。你既把法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党，又称之为联合的党，这岂不是有矛盾吗？

在我们的政策中有些词是关键性的，自由是其中的一个，联盟是另外一个。

联盟是我们政策的一项始终不变的原则

对我们来说，联盟并不是权宜之计，因局势而变化的手段。联盟是贯穿我们全部行动的指导思想。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联盟是保证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事实证明：工人、民主和民族力量的分裂总是意味着正义、民主以及和平的倒退。相反，联盟一旦实现，总是对我们的人民和国家有利。

正是基于这个根本的理由，我党一贯热忱而耐心地致力

于团结一切工人，把财政寡头政权的一切受害者、民族的一切有生力量都联合在工人的周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争取联合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党一成不变的原则。

我党的全部历史贯穿着为实现劳动者的团结，工人、民主和民族力量的联合而进行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不同阶段以下述口号为标志：统一阵线、人民阵线、法兰西民族联盟和全国阵线。

的确，这个斗争今天具有新的规模。

为什么呢？

我已阐明，我们的全部行动是以对法国现实的分析为依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面是巨大的力量集中到大资产阶级（和少数为其服务的特权者）的手中，一面是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日益恶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剥削，已不仅仅涉及工人阶级，垄断制度已把这种剥削扩大到整个社会。因此，人民的绝大多数，包括工人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及其仆从者之间的矛盾正在发生、加剧和深化。

这就是大资产阶级的自私和残忍的政策，以及它的无限贪婪的必然结果，它导致所有受到这一政策之害的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一致起来，从而增加了使它们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的可能性。一九六八年五月至六月间的强大人民运动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那时以来所进行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所证实了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这些斗争在发展、扩大，汇合一起并趋于成熟。

这就是我们联盟政策的基础。法国并没有分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部分。尽管社会阶层、政治派系和思想流派的情况很不相同，其决定性的分界线是：一方面是统治经济和国家的一个小集团；另一方面是以劳动为生并为国家服务的广大群众，垄断资本的受害者。和最直接地遭受资本主义残酷剥削的工人在一起的还有：职员、农民、工程师、技术员、教员、艺术家、商人、手工业者和中小企业主，他们构成受到大资产阶级政策严重危害的人民的绝大多数。组成我们人民的这些男女，都渴望变革，尽管理由不一样，其自觉程度也不同。他们成为巨大的力量。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并采取共同行动来反对其主要敌人，这股力量将是不可抗拒的。因此，政府当局竭力分裂他们，使之相互对立。而共产党却相反，努力使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断然唾弃所谓“积极的少数派”的这一概念，根据这种主张，一些坚定的小集团，可以通过自己的“模范”行动推动广大人民群众，并使其投入革命。人们不可能在没有人民参加，更不可能在反对人民的情况下为人民造福。这条道路，是自我孤立的道路，冒险和失败的道路。正如左倾集团的行为所表明的，这往往也是挑衅的道路，它只能对反动当局及其镇压政策有利。我们的信念是，在我国，如果没有一个由绝大多数人参加的、由一切要求变革的男女所结成的强大联盟，任何真正和持久的变革都是不可能的。

为了实现变革的联盟

这是从经验中得出的教益，不管是法国的经验，还是国际上的经验，我在这里主要是指智利的悲剧性事件。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是必须有一个牢固地团结在清楚、明确和创新的目标周围的相当广泛的直到包括人民大多数的人民运动。我们所提出和为之而努力的联盟，并不是把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不满分子聚集在一起，也不是在侵犯者和受害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进行调和。它是一个既反对一些东西又要争取一些东西的联盟；是所有受到工业和金融集团之害的人联合起来，反对由一个小集团统治和窒息国家，争取实现民主变革——这个变革在实现深刻民主改革的同时，将给那个小集团以沉重打击。这同时也是一个战斗的联盟，因为，只有对控制经济和国家机器的寡头财团进行坚定不移的阶级斗争，联盟的目标才能实现。

因此，我们建议一切愿意看到我国从财团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人们，不是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而是在明确具体的基础上进行联合并采取行动：推翻用一切手段来压榨他们的大资本主义公司的统治，为每个人能在安全和自由的环境中劳动而创造条件，也就是保证实行共同纲领。法兰西人民联盟，就是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为其取得胜利而一起斗争。

我们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种主张，给这个联盟的每个组成部分以最可靠的保证，使它们的特点、利益和自己的要求

不会被否认、拉平或忽略。对我们说来，联盟并不是一种杂物间，晚间在里面所有的猫看上去都是灰色的。我们不仅考虑到我国人民的不同特点，而且十分重视这些特点。

我们希望联合的各社会阶层，有着共同的基本利益。它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但大部分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只要这些社会阶层认为政治变革符合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它们就可以牢固地团结起来并一致行动来争取实现这一变革。它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差别的，各阶层有自己的本性、特色和作用。今天的联盟，明天的国家——如果联盟一旦取得胜利，都需要这些独特的贡献，并因此而更加丰富多采。

所以，在我们所提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个口号和我们主张工人阶级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和必须发挥先锋作用之间丝毫没有矛盾。

工人阶级的作用

在这个广泛联合的中心，有一个阶级表现为争取变革斗争的动力和先锋，这就是工人阶级。

有人说，我们关于工人阶级作用的看法是机械的，是过时的教条…… 这种说法不对，只需要看看事实。

确实，主要财富是男女工人创造的。他们在生产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他们的人数、他们在我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分量是巨大的：两个工资收入者中就有一个是工人。这就是工人阶级在社会斗争中成为决定性力量的第一个理由。

但是，男工和女工，同样也是整年生活艰难的人，甚至吃

饭也有困难，他们的住所设备最差。他们从大城市的中心被驱赶到远郊区；流水作业的劳动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常常遇到工伤事故；他们的寿命最短；他们的孩子上学最晚，其中绝大多数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他们很少享受到文化和娱乐。他们对企业的经营没有任何监督权，根本不能参与公司的管理。

换言之，工人阶级最关心把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工人阶级成为争取变革行动的先锋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是：工人阶级集中在企业内，集体地和直接地受雇主的剥削，它开展斗争，并在几十年漫长的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经验，提高了阶级觉悟。工人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它拥有一个革命的政党：法国共产党。

因此，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一切旨在否定工人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斗争，以及在领导国家事务方面应起突出作用的主张，都将损害变革的机会，甚至危害到变革本身。社会党正是这样干的。它在制定战略时，强调“拒绝任何社会先锋的概念”。

我们并没有提出要人民中的其它社会阶层溶化到工人阶级中去。相反，我们认为它们进行斗争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帮助它们达到此目的。反过来，我们也认为，工人阶级不但有权利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致淹没在毫无区别的整体中，而且应该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战斗中真正发挥自己的作用，一切事实都证实这个作用就是先锋的作用。因此，我们坦率地告诉组成我国人民的其它社会阶层，它们的斗争只有在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汇合在一起才能见效并取得胜。我

们对他们说，如果不让工人阶级在国家的生活和国家事务的领导方面占有自己的地位，法国社会最终将遭受不幸。

一致的利益

因为工人阶级并不想剥削任何人，它所进行的活动中没有任何东西违背全体人民的利益。相反，它日益把争取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受害者的要求当作自己的责任。当大资产阶级把它的剥削、统治和掠夺扩大到其它工资收入者和广大人民时，越来越多的男、女就更好地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目标是一致的。

以知识分子为例，他们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他们现在也受到危机恶果的严重打击。人们有时企图归罪于知识分子，试图使知识分子相信他们不应提出“量”的要求，他们是属于一个“特权”的阶层……。这是故弄玄虚。今天，二分之一以上的教员和技术员、五分之一的中级行政干部、十分之一的高级干部每月的工资不到四千法郎，即等于一个高级熟练工人的工资。在此情况下，难道要求提高购买力是荒唐、不光彩的吗？不！不按价值付给脑力劳动者应有的工资倒是可耻的。

事情还不止如此。知识分子的处境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所有脑力活动的部门，目前都遭到最大的困难。教育事业的物质和人力条件严重地不足。在我国，一千个居民中大

学生是十五人，在美国是四十五人，在苏联是一百九十人。在苏联，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教员，在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每八点五人中有一个教员。法国所有的研究中心都由于当局的非难而处于贫困和窒息状态，不论是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大学、巴士德研究院、原子能委员会、还是全国农业研究院，全都如此。我强调说：“非难”。主管部长不久前在确定政府在这方面的目标时，并不掩饰它企图恣意使国家置于“科学苏醒状态”。因此，在拉瓦西埃、巴士德、约里奥·居里和德·布罗格利的国家里，对癌的研究只能取决于经济的景况或依靠公共资助。

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普及、历史文物的保护等领域的情况又如何呢？文化部的预算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不到百分之一。歌剧院和法兰西喜剧院遇到严重困难，而人们对蓬皮杜文化中心也感到忧虑，这三家就花掉了现行预算的绝大部分。大部分音乐家、喜剧演员，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去寻找职业。电视台购买美国最次的系列片。推广让·维拉尔关于剧院分散经营的人民民族剧院的重要经验受到全面的威胁。画家和雕刻家看到展览场地和实际交流的条件愈来愈差。电影由于发行和经营单位的集中而被控制起来。

这种情况不能不向知识分子提出严重的问题。他们拥有的条件极其有限，指定他们进行的活动经常不能与当前的现实和需要相适应，他们不得不服从专横的决定，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没有出路，新创作的作品找不到市场，部长们亲自进行贬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运动，这一切使研究人员、大学教员、艺术家对自己活动的目的性提出了疑问。某些人甚至怀疑自己

活动的价值,灰心丧气,或者去寻求错误的解决办法。

知识分子从我们呼吁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去争取的民主变革中能得到什么呢?

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我们在社会方面的建议规定,按照递减的比率提高工资的购买力,直到最低工资的四倍,即每月八千八百法郎。这涉及到哪些知识分子呢?首先是绝大部分教员。此外,根据一九七七年初的一次调查,百分之九十九的技术人员、百分之九十的中级行政干部和百分之六十二的高级干部都属于这种情况。

对于其它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占工商业工资收入者的百分之二点二,我们规定他们将保持自己的购买力——这与目前的趋向正相反。

我们关于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也直接涉及知识分子。现政权每年制造十万至十五万毕业生失业者;近年来,成千上万的辅助教师在开学后找不到工作,职业艺术家遭受到不断扩大的失业的痛苦。

如果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变革政策取胜,知识分子就会象全体人民一样,在生活条件、交通和集体设备方面都会得到改善。

他们将拥有进行职业活动和发挥才能的必要手段和自由,这些手段和自由今天对他们已越来越必要。

谈到手段,我当然是指装备方面的手段,开展各种智力活动立即需要的手段。但是,我也考虑到其它一些并非次要的东西。

社会的不公正,贯穿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严重地影

响着文化的发展。例如在教育制度方面由此而产生并竭力推行的隔离政策，浪费了成千上万的有才智学识的人才。使一部分人民完全被剥夺了提高文化素养的实际条件，这是使国家丧失在各个领域中取得进展的巨大潜力。

当二分之一的法国人每年看不上一次电影，从来也不买书；当大量的劳动者从来也不去看戏或听交响乐，怎能不影响创作呢？当现政权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命令主义来加强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时候，工程师和干部进行设计和创新的能力，怎能不受到强迫命令接受的任务的影响呢？这种任务歪曲了他们的主要天职，限制甚至禁止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和积极性。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社会的不公正，就这样缩小了知识分子活动的天地和可能性，有时使他们的才能和天赋误入歧途。

因此要为提高文化而行动，就必须使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真正的改善。这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在为此目标而奋斗时，我们感到是在切实有效地为我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努力。

事实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族和人类的进步，文化、科学和技术的昌盛，在我们看来，都是密切相连的，也就是说，它们必须齐头并进。

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念，以及我们为之而进行的行动，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哲学、我们的理想之上的。

我们要使劳动者及其家庭要求生活得更好的愿望得以实现。生活得更好，就是要能运用现代化的手段，来满足他们当前的需要，并考虑到彼此的需要都在不断增长。我们不去赶

时髦地反对“消费社会”，因为对劳动者家庭来说，肯定谈不上什么消费过度。

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改革，将使每个人——如同我们所讲的——有生活的时间和手段。这个改革将大力要求发展各种智力活动，以满足生产、劳动条件、教育、卫生、城市建设和文化方面的需要。

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二大上所阐明的，那次代表大会使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主张成为我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所希望建设的法国，“科学和技术将成为全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成为改变我国人民命运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今天各种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手段——不论是他们开展活动的装备或条件——也是工人阶级本身和我们的国家所缺乏的手段。

恩格斯曾愤慨地看到这种情景：工人被迫所进行的劳动，吞没了其全部时间，很难享受到吃饭和睡觉的乐趣，不能在露天之下舒展身体，领略大自然的风光，更谈不上什么智力活动。难道这种时代已经离开我们很远的吗？不，不仅是数百万专业工人，而且广大劳动者、工人和职员今天基本上仍是这种处境。我们希望科学、技术和教育不仅能保证经济取得新的强有力的发展，为社会进步服务，并且依靠社会进步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不仅希望科学、技术和教育能够减轻各种家务劳动，改造住所和环境，在各个方面改善生活，以提高家庭生活的水平；我们也希望科学、技术和教育系统地用来改善和改变劳动条件，使劳动更有意义、更加专业化、责任更重。

在我们看来，研究人员、工程师、技术员必须拥有必要的手段来创造效率更高、更安全和更复杂的机器和装备，这和劳动者的职业培训以及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重新估计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能力、主动精神和责任感所发挥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这和提高劳动者的质量、发挥其才干和主动性也是相辅相成的。

对自己进行的研究、教育和创作活动的社会作用今天还有疑问的人，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答复。

核能源问题

这是国家的一件大事，我们愿对此负起自己的全部责任。对科学的发展及其使用所引起的复杂问题，我们从不采取闭关自守的立场。例如，我们认为把核能用于和平的目标是必要的。如果发布命令说不需要核能，这是蛊惑人心，是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对于法国明天能掌握多少能源的问题不能无动于衷。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甚至更胜于其它问题，在行动上必须区别对待。而人们至今尚未这样做。因为人们把全部赌注压在石油上，放弃了煤炭的生产，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后来，人们提出了“一切核子化”的口号。但是，今天看来，这个口号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应该平衡地发展各种能源；核能在其中有自己的地位。当然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安全保证措施。必须保护风景和环境。必须同建设核电站有关地区的居民协商一致。这些条件做到后，就应由有关方面对建立核电站逐项作出决定。

当然，我们也了解，有些理论，认为亚马逊或新几内亚的原始人比我们更幸福，或者至少只能谈到有区别而不能谈及文明的进步。我们知道，由于现行制度对科学进步作有害的使用，使一些人感到愤慨，甚而责怪科学进步。有的年青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感到痛心而试图逃避现实，把自己装扮成塞文山上的牧羊人。我们并不想阻止他们这样做，但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根本不愿意向后倒退，而且希望男子和妇女更有觉悟，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受到更好的培训，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劳动——按照笛卡儿的说法，就是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科学社会主义进一步指出，要成为大自然和社会的主人和所有者。这是我们具有的一个特点：我们相信人类的认识是无限的，并对此极为珍视。我们相信各种技术的不断进步是必要的，因而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必须得到自由的发展。我们希望把科学革命从追求利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之为满足人民的需要服务。大家都懂得，这就需要大力增加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开展活动的手段，同时要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

但是，我们并不是技术和现代化主义的癖好者。我们主张与人类相适应的经济和社会，使人类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保证其个性、智力与体力的全部机能得到发展，使今天人们所称的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联盟，是头等大事

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团结和共同斗争的客

观基础。这个基础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处境、对自由的需要、生产进程的演变、对发展以为人服务为目标的经济要求，以及为了全民族文化发展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工人阶级对此是了解的。它支持知识分子要求充分发挥其才能的热望。它寻求这个联盟，并竭力在日常情况下为此而创造条件。它并不把这个联盟看成单一的联合，把其中每个社会和思想组成部分的特色抹煞掉。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说：正因为你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才需要你们。工人阶级对自己在全国范围内所起作用的认识，保证了在进行联盟的过程中尊重知识分子。反过来，知识分子也应该认识到：不与工人阶级联盟，知识分子本身以及他们自己竭诚进行的活动都是没有出路的。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的时代，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已成为头等大事。

这个信念是我们称为我们“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决策。因而它排除了现政权擅长的搞歧视、搞阴谋诡计和玩弄手法的恶习。在一九七七年六月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演讲中，我曾庄严地谈到这一点，我愿意再说一遍：明天，我们不打算用另外的歧视和阴谋来取代这些歧视和阴谋。报复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不是那种现在就对自己的政友封官许愿的人。在我们看来，靠一个党的党证，不管是那个党，靠拉关系，都不能象“芝麻给我开门”这种神咒一样解决职业、展览、出版或工作职务问题。我们要使法国继续发扬光大，这只有和全体人民一道奋斗才能做到。

我们尊重各社会阶层的不同特点

我们本着同样的精神对待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们对农业耕种者说：在人民力量的联合中，你们完全有自己的地位，因为你们也是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受害者，因为工人阶级、国家都注意维护你们的生存，并向你们提供发展繁荣的法兰西农业的手段。

我们对人们称之为中间阶层的数百万法国人说：你们是手工业者、小商人、中小企业主，这很好。你们发挥着有益的作用，你们不仅在民主的法国有自己的地位，而且在我们所希望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自己的地位，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你们。当然，你们的利益不一定都与工人的利益一致。我们也不隐瞒我们一贯维护并将继续维护工人的利益。但是，归根到底，你们只有站到工人阶级一边，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才能解决你们当前的迫切问题，为你们的未来获得持久的保障。

我们就是这样考虑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在尊重各自特点的情况下，使各阶层人民切实地联合起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现政权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执行的不公正、专制和抛弃民族主权政策的受害者。

不同特色也表现在哲学和政治方面

法兰西的不同特色不仅表现在社会方面，它同样也表现在哲学和政治方面。因此，对我们来说，法兰西人民联盟也就

是：反映法兰西民族历史现实并促进其进步的各种不同的思潮和宗教信仰，在尊重各自特点和言论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联合。

我国今天发生的一切，表明我们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着重阐明的主张是完全有道理的：我国人民中间存在的各种不同的思潮，并不成为在变革目标的周围实现联合的障碍；相反，它能使人民运动更加丰富多采。

特别明显的是，大量的天主教徒已经无所畏惧地唾弃了垄断政权的政策，并明确地表示希望能发生变化，使每个人能享受更多的公正、自由和尊严。我们和天主教徒及其教会已经进行的对话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双方在工厂、城市或农村都采取了新的态度；相互接近、谅解和合作已成为常事。我们将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在这条道路上稳步前进。

那些至今还没有站在左翼一边，但却十分关心民族利益、国家独立和威望的法国男女们，同样面临着重要的抉择。他们中间很多人支持戴高乐主义。但是，他们已不再属于目前的“多数派”，不属于吉斯卡尔——希拉克——勒卡尼埃的联盟，因为这个联盟把我国工业的某些完整部门一个接一个地转让给美国和西德，它想为了具有超国家权力的财团的利益而使我国丧失主权，它使得法国在当代重大的国际事务中默默无闻。当这些戴高乐主义者看到，施密特和其它德国领导人企图使用否决权反对共产党部长在法国参政，来干涉法国人民内部事务时，他们完全有理由感到义愤。他们寻求各种办法使自己对国家的关心变得更加有分量，更加有效。某些人正在设法重新组织起来，另一些人尚未组织起来。不管组织起

来与否，我们都可以为了一项民族复兴政策的胜利而共同努力，这是我们的信念和愿望。由于这是我们的一项原则性政策，所以我们坚持这一主张，更加重视为这种合作创造条件。在维护民族利益、法国的独立和威望的斗争中，极为关心国家的繁荣和国家资源的充分利用、渴望领导国家以保证全体人民进步的工人阶级——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理所当然地站在斗争的前列。只有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和支持工人阶级的观点和利益的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这些爱国者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国的主权，为它的尊严和昌盛而战斗。在我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已有生动体现的长期实践，表明这是可能的，而且对国家是有利的。

当我们声称他们在对各左翼政党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在修订后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盟的完整的组成部分时，我们正是想到了这些男子和妇女。社会党不愿意这样做。但我们认为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对我们来说，它已列入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议程。

绝大多数人参加的、强大的群众运动

总之，我们不仅要继续，而且要从各方面进一步努力，来保证所有关心民主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合作。我们将向他们表示最广泛的开放精神。我们坚定不移地忠于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和理想，决不会对我上面讲的重大任务——建立一个能保证我国人民所期待的真正变革的、由绝大多数人参加的强大群众运动——采取谨小慎微的冷漠态度。

因此，人们清楚地看到，法国共产党完全可以自称既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又是人民广泛联合的政党；这两种说法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左翼联盟

各左翼政党在牢固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是我们竭力推动建立的这个大多数人联合的轴心。就是说，联合要建立在很好的共同纲领基础上，这一纲领的贯彻将能使法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变革。看得更远一些，我们党也主张左翼政党——首先是共产党和社会党——在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长期合作。事实上，左翼联盟的政策对我们来说，不是一项暂时的策略。这是我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一贯声称，我国所需要的社会变革不可能仅仅是一个党的任务，即使是象我们这样的党。在我国，各民主政党之间的合作乃是使改革社会取得成功的一个条件。

当然，这种合作建立在尊重参加合作的各个党的特性的基础之上。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坚持自己的特性，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也如此。我们远不认为不同的特性与联盟是对立的，而是把它看作法国当前和今后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要一党制，不管是什么样的党。我们要求在明确、诚实的情况下实现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不同组成部分的独立性和个性，将不成为其取胜的障碍；相反，当这些力量为了实现共同承担的义务而共同行动时，它将成为联盟的力量、发展和胜利的一个因素。

这就要求合作持久地建立在权利和义务均等的基础上。就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统治任何人的野心。尽管我们党的影响很大，我们决不提出过分的要求。

这也同样要求——而这是首要的——联盟的基础是坚决反对大资产阶级对我国的统治，争取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造，为走向社会主义开辟道路。

联盟本身并不是目的

事实上，对我们说来，联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使现实情况改变为符合劳动者、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

如果联盟不能消灭失业，它还有什么用处？

如果联盟不能提高工资，不能保证每个法国人的收入能使他过我们时代应该享受的生活，它还有什么用处？

如果联盟不能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劳动条件，它还有什么用处？

如果联盟不能制止物价上涨，它还有什么用处？

如果联盟不能保证劳动者、法国人有权利得到房租适中而条件舒适的住所，有权利维护自己的健康，有权利保证其子女受到教育，它还有什么用处？

如果联盟不能使每个人都有条件提高文化，它还有什么用处？

联盟只有使另一种政策，即为劳动者、为普通人服务，为我国的人民和国家服务的政策得以实现时，它才是有意义的。

持久的战斗

这就是我们党为何长期来为争取在具有“先进的经济和社会内容”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如同我们所讲的那样——实现联盟而斗争的原因。我们进行了十三年顽强的努力，才使得社会党，后来是左翼激进党和我们一起接受这样的纲领。左翼共同纲领签订以后——这个纲领确定了当时符合劳动者、老百姓家庭和国家所需要的崭新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我们曾注视着已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多次批评了我们的伙伴企图冲淡共同纲领的内容（或者是干脆使人忘掉共同纲领）。人们有时甚至认为我们过于忧心忡忡，疑神疑鬼……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即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想推翻左翼共同纲领，不幸地证实了我们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今天，联盟的根本问题——联合起来干什么？——再次被有力地提了出来。

因为左翼联盟并不象一个合同，只要签了字就足以保证得到履行；它是一场持久的战斗。这是由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决不甘心看到工人和民主力量的联盟，并动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不断地反对这一联盟，企图粉碎它。其次是因为社会党容易屈从右派以及国际上对联盟的压力，特别是参加社会党国际的各社会民主党的压力，这种说法绝非臆想。说一旦左翼的力量对比对社会党有利，一旦它能够驾驭左翼时，它将重新执行与大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这也不是凭空捏造。这只是历史的教训，是法国和

其它一些国家的历史教训，在那些国家里，共产党的影响不大，社会民主党就拒绝任何联盟，并搞反共主义，直至损害自由，并去替大资产阶级管理事务。

当我们和社会党一起通过了共同施政纲领时，有些工人和普通人对我们说：“有必要和一个改良主义党结盟吗？难道这样做没有危险吗？社会党难道不会利用联盟来达到其他目的吗？”当然，今天这类疑问就更多了。提出这些疑问是合乎情理的。

的确，社会党仍然是一个改良主义党，认为签订了共同纲领——尽管它有可能带来一些变化——就足以改变当前的情况，这是天真的。这是因为：社会党的性质是和它的全部历史，领导机构的社会成分，它在理论上缺乏连贯性，和它长期与右派进行合作相联系的。与右派合作仍然是社会党突出的习惯，特别在一系列的市政府和议会中是如此。此外，社会党还竭力声言它是雷翁·勃鲁姆事业的继承人。

可见，为改革社会的斗争服务的联盟是必不可少的。符合劳动者的利益并有着明确前景的联盟，这是我们的战略。我们不会改变、也永远不会放弃这一战略。

如何实现并保证良好的联盟？

那么如何实现、保证和扩大一个战斗的、持久的联盟，一个扫除大资产阶级的希望并粉碎他们的盘算的联盟？

这里需要有一个强大、积极和有影响的共产党。

这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理论上的教条。共产党是在

任何情况下唯一拒绝替大资产阶级管理事务的党，是唯一不断号召劳动者进行斗争反对向大资产阶级屈服、退让和进行阶级合作的党。作为政党，共产党是唯一始终进行斗争反对镇压工人、反对侵犯民主制度、反对个人专权的党。作为政党，它是唯一起来反对殖民战争以及伴随殖民战争的屠杀、酷刑和破坏，支持殖民地人民独立的党。作为政党，它是唯一一贯为反对任何放弃民族主权的政策、反对任何对法国独立的侵犯而斗争的党。它善于耐心而坚定地引导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这些斗争。自从签订共同纲领以后，法共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倡议，批评了迟疑和退缩的态度，以便巩固已达成的协议，在生活和实际行动中肯定共同纲领，如同人们所说的“把面团发起来”。因此，人民运动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已接近选票的半数。每个人都能证明，在这场战斗的全部过程中，我们党对联盟事业是最光明正大和完全忠诚的。

如果人们今天要求为了在法国真正进行政治变革而实行联合，就不能无视这些不可否认的事实。

劳动者、小人物都了解，和我们在一起他们将得到保护，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社会和经济措施将不会被埋葬，也不会被推迟，所有人的自由——特别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但今天被剥夺了的自由——将得到尊重。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大家都享受福利；我们的方法，就是民主。对，我们保证：对劳动者承担的义务一定会履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党。工人聚集在共产党内，他们在各级组织都占有首要的地位，这个地位符合工

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符合他们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所承担的先鋒队的责任，符合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坚定性。在共产党内与工人在一起的还有大批的雇员、技术员、农民、教员，人数日益增多的工程师、手工艺艺人和文化人。在共产党内，渴望真正平等的妇女们团聚在一起。总之，共产党是人民的中心，是人民的生活和期望的中心。劳动者、普通人、不同年代的人都在共产党内团结在一起，他们怀着共同的愿望：为了根除贫困、束缚、不公正和不民主而改造社会。

在共产党内造就了它的领导人，数以千计的被选上的人，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他们被劳动者选送到不同的负责岗位上，在工作中表现了自己的忠诚、才能和无瑕的廉洁。

正是由于这些简单而又深刻、持久的原因，法国共产党不可分割地既是主张改革的党，又是主张联盟的党。它是主张联合起来实现变革的党。

(7)

今年九月二十二日，法共、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人运动关于修订左翼共同纲领的讨论中断了。左翼向何处去？这种形势无损于变革吗？

五年多以前，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工人和民主运动史上没有先例的重大事件：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通过了共同施政纲领。左翼激进党人运动很快也在纲领上签了字。

这一纲领为深刻变革提出了明确而协调的前景，它符合劳动者、热爱民主的一切男女和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共产党人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开展的斗争

一年以前，我们党对形势进行详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我国已经进入深刻的全面危机时期，进入了必须对社会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的时期。

我们认为——当时我们的伙伴们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共同纲领恰好就是这种“新的解决办法”，它将结束现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协调现象，并开辟进而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确实，就其总体来说，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措施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最大胆的社会政策。通过调动一切生产力，清除浪费，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保障真正的经济发展，从纲领规定的一整套经济改革中可以找到实现这个伟大社会政策的手段和必要的财源。而且，这一整套民主措施的实施将表现为劳动者和公民大规模地参与领导、管理和监督公共事务，表现为自由的大发展。

总之，这个共同纲领已成为争取真正变革的完美联盟的牢固基础。我们共产党人为达此目标奋斗了十三年，当然首先为左翼共同纲领的第一个战斗阶段所取得的美满结果感到高兴。

从宣传共同纲领的战斗到修订共同纲领的战斗

从这个共同纲领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完全把它当作自己的纲领。经常是只有我们坚持不懈地广泛宣传这个纲领的内容，争取最大多数法国人支持它的主张和建议。这是战斗的第二阶段。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行动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尽管共同纲领遭到右派的猛烈攻击，尽管我们的伙伴也企图摆脱它或削弱它，这个纲领还是日益具体地反映了劳动者要求变革的愿望，日益唤起千百万法国人追求更加美好的、新的生

活的憧憬。左翼在一九七三年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进展，在一九七四年的总统选举中差一点获胜，在一九七七年的市镇选举中基本上稳住了自己的地位。

事实证实了十五年来我们所作的分析的价值。依靠这个纲领和它的富有鼓动性的内容，联盟有了长足进步，“改变生活”已成为垂手可及的具体目标。

距一九七八年三月很可能获胜的议会选举不到一年，面对我国社会的总危机，面对贫困、不平等、不公平、浪费和放弃民族自主——这些给我国人民造成苦难和招致反抗——的局面，一切都要求左翼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忠于己为广大劳动者认可的纲领，强调推动变革的创议的意义和有效性，把改变法国事态进程的愿望化为实际行动。

因此，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表明我们获胜机会增大的一九七七年春市镇选举之后，我们以我们党的名义向我们的伙伴们建议具体着手修改一九七二年的纲领。于是，我们进入了争取实现共同纲领、争取左翼获胜的行动的第三阶段。

争取真正变革的好纲领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共同纲领的总方针和重要目标今天依然完全适用。但尽管如此，一九七二年以来在许多方面情况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修订纲领规定的社会目标、经济手段、民主改革和对外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一事实。诚然，不能离开纲领的基本条款的规定，必须遵照其总的方针。要使共同纲领在一

九七七年能够保持其全部有效性，要使纲领的实施确实能够带来处境日益窘迫的法国所渴望的变化，这样的修订是必不可少的。

本着同样精神，我们曾说过，既然机缘临近，就必须确定执行共同纲领的日程和具体方式。劳动者和法国的男女完全有权要求我们明确说明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我们要求他们给予支持的伟大变革，而不象右派那样总是许下大量空洞的诺言，却从来也不去兑现。

因此，我们这样做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用意，也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要“挥舞指挥棒”。我们仅仅是要使共同纲领的条款确能保证一九七八年实现它在一九七二年规定的真正的民主变革。

谁想了解我们的观点是否确实如此，可以参阅三月三十一日我在我党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该报告通过和发表时用了一个有意义的标题：《走向民主变革》。

在谈判的每个阶段直到最后，我们都提出了一些符合现形势要求的具体问题的具体建议，提出了一些事先经过仔细斟酌并尊重人们称之为纲领的“平衡”，即它所具有的妥协性的完整建议。我们从来没有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也没有事先就否定我们的伙伴们提出的任何建议。我们不辞辛劳地不断努力使谈判能够得到进展。对于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都提出了建设性的妥协建议。总之，为达成良好协议，我们尽了一切努力。

社会党放弃了共同纲领

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尽力达成协议呢？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基础之上吗？显然不是。当然，众所周知，我们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为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我党二十大郑重声明的目标，任何力量也不能使我们离开这一目标。尽管我们从来也不掩饰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但我们并不要求任何其他政治力量也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把它强加于人。不，我们当时讨论的议题不是社会主义，而仅仅是一九七二年的共同保证。我们于一九七二年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联盟，这一纲领是双方妥协的产物。我们认为这只是前进了一步，而别人却认为这已是终结。让人民到时候来裁决吧。但我们批准了这个纲领，因为它确定了一项可以使我国摆脱当前危机的政策方针和伟大目标。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依然信守一九七二年达成的这些保证。

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进行必要的讨论，并通过这种讨论对共同纲领进行圆满的修订。我们有权期望我们的盟友采取同样态度。

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让事实来回答吧，也就是让社会党在讨论期间和讨论失败后所采取的立场来回答吧！

社会党拒绝把可增长最低工资提高到各大工会要求的水平，反对大量提高低工资，反对切实缩小低工资和高工资之间的等级差距。

它完全放弃了三个左翼政党共同建议的每年增加五十万

人就业的主张。

它反对对巨额财产征税，在国民议会中拒绝投票通过征收资本税，摈弃了对确定价格实行民主监督的主张。

它基本上拒绝了一九七二年规定的国有化，不愿听到要对冶金、石油部门、对褒其犹一雪铁龙工厂实行国有化，而这正是两年前它自己提出的。

它宣称要自治，但要求国家来任命国家企业的总经理，反对工会活动时间工资照付，拒绝各种选举中实行比例选举制，拒绝海外省和海外领地有自决权。

它否定国家能源应独立自主，它提出的该政策将使这个重要部门依附于美国。

最后，它还拒绝法国拥有有效的防务手段，主张建立超国家欧洲。

必须说明，我这里列举的仅仅是人所共知的社会党的公开立场。

这些立场的每一项都构成一种倒退，与一九七二年的保证相比是大倒退。这些立场贯穿起来，将取消五年前共同制订的全部新政策。这不是臆造，而是有案可查的。事实使我们遗憾地得出结论：社会党已决心摒弃共同纲领的内容，背离纲领的根本方针，抛弃这个纲领。必须指出，这种态度说明，引起我们注意并做出反应的这些事实是含义深长的。

转向右翼

从今年初开始，米歇尔·罗卡尔就反复声称，重要的不是

所有制，而是企业中的权力，而共同纲领明确指出，国有化意味着由国家占有。这属于一般常识问题，人们自然会问，如果企业留在大资产阶级手中，劳动者如何在企业中行使权力？

其次是雅克·阿塔利关于对国有化企业股东给予赔偿的论点。这些论点归根到底是要使大资本原封不动。

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同雷蒙·巴尔的电视辩论中就是持这种态度的。大家都注意到，在这次辩论中，他离开了共同纲领，并向吉斯卡尔派的总理保证他将否定我们党的建议。

在南特代表大会上，弗朗索瓦·密特朗向共产党提出了名符其实的最后通牒，他使社会党的纲领压过共同纲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人们还宣称，社会党想“达到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四〇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社会民主党人获得的统治地位”，说穿了，就是想单独执政。

正当在法国讨论修订左翼共同纲领时，共同市场社会民主党联盟的共同纲领草案于六月份通过，而法国社会党是这个联盟的成员。这个文件是忠实管理陷入危机的垄断制度的纲领。联盟主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勒舍尔在报上是这样评论这个纲领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为有朝一日成为共同体的主导力量而斗争；谈不上同欧洲共产党人合作的问题……”

弗朗索瓦·密特朗七月底，即恰好是我们三党代表就法国安全和独立政策寻求共同点的时候，发表谈话提出他不相信自主防务，并建议在选举以后就装备核武器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

上述事实使我们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不得不申明，弗朗索瓦·密特朗显然是想向大资产阶级作出

保证。关于修订共同纲领的讨论过程证明：从年初起，社会党已明显地向右转。它拒绝就修订共同纲领达成协议，从而决心把共同纲领抛到一边，就是这种转折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最能说明问题的表现。

自从社会党中断谈判以来，每周都有新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社会党采取这一立场出于什么考虑

这是人们脑子里立即就会出现的问题，许多男男女女自然向我们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距决定性的选举只有几个月，社会党决心要分裂左翼呢？正当一切迹象都表明左翼胜利在望时，怎么可能抛弃凝聚着人民运动希望的共同纲领呢？一个政党本应倾听其选民要求变革的深刻而合理的愿望，如何理解在关键时刻它却为政府改头换面继续执行大资产阶级政策敞开大门呢？

社会党的这种态度乍一看确实令人费解。但应该认识到有许多因素在促使它几乎自然地朝这个方向发展。

这有其历史传统。尽管有些领导人竭力把社会党说成是一九七一年诞生的，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它继承了同资产阶级、同右派合作的悠久历史。

这也是它的本性决定的。因为正如我们在一九七二年就已指出的，它目前是、今后也仍将是一个迷恋改良主义的党，也就是说只是主张对现存制度作些调整。还有它的社会成分，在这方面只需指出在最近召开的南特代表大会工人代表

只占百分之五就够了。反之，统计表上称之为“高级干部”的占百分之十九。实际上，这个称呼主要是指一个非常特殊的干部阶层，罗卡尔、阿塔利、德罗尔、法比斯、若克斯、若斯潘等人就属于这一阶层，他们是国家的高级干部，现在已掌握了社会党的领导。这些人所占的比重之大，已成为社会党的一个新特征。这个特征对欧洲所有社会民主党也都是适用的，这些党的工人或小职员出身的领导人均已被大资产阶级卵翼下形成的技术官员所取代。这种情况给法国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增添了新的色彩，它虽然在理论上很不协调，但深深地打上了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技术至上思想的标记，这种思想把左的词句同要求管理陷入危机的国家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

最后法国社会党同国内外拥有各种施加压力的手段、同大资产阶级制度相联结的势力有联系。尤其不能忘记，法国社会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由赫尔穆特·施密特和维利·勃兰特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控制的这个国际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大肆活动。一九七六年二月我党二十二大上，我们就曾指出法国社会党容易接受国际上、特别是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党对联盟施加的压力。应该指出，自此以后，特别是一九七七年初以来，所有观察家都注意到法国社会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明显地加强了。今年二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德勒舍尔认为，在法国社会党的思想中无可置疑地出现了朝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发展的“变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些事实今天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是我们、而且大家都是这样讲的。

后退一大步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社会党方面没有作出明确而具体保证的情况下，使它有可能利用共产党和寄希望于共产党的几百万法国人作为建立一党政府或联合其他人——但不包括共产党人——共同执政的垫脚石，改头换面执行同现今一样的政策，这就等于在整整一个时期里为变革愿望敲响丧钟。

共产党对劳动者和我国人民怀有高度责任感，不能同意它这样干。

我们从来没有向劳动者许下诺言而不去兑现。我们从来没有欺骗他们。我们从未与人合谋来欺骗他们。

然而，如果象社会党试图做的那样使人相信，在这不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向变革跨出“一小步”，那是骗人，是愚弄法国人。我们建议遵守并修订共同纲领，这是为推动变革所必须做的最起码的事情。社会党抛弃共同纲领的结果，不是向前迈一小步，而是向后退一大步，这是迎合大资产阶级愿望和图谋的一步。

大资产阶级完全了解它的失业、贫困、物价上涨和专制政策招致人民不满的广度和强度。它是否因此而改弦更张呢？否。它竭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如有可能，它甚至还要加强这一政策。因为劳动者的苦难正是工业和金融垄断势力的幸福。然而，这个大资产阶级遭到厄运：它的政治基础狭窄并且摇摇欲坠。如果明天它能得到脱离了共同纲领的社会党的某种形式的支持从而扩大这个基础，那么它将会有美妙的前景。

它就可以继续让人民群众承担大资产阶级制度日益加深的危机重荷，而同时保持自己的政权、特权和利润。

在欧洲一系列国家中，大资产阶级正是这样做的。事实是说明问题的：在这些国家里，大资产阶级在推行其政策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劳动者的处境比我国还坏。在法国，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巴尔先生终于使工人购买力一年内降低了百分之三。在社会主义者卡拉汉领导的英国则降低了百分之七。在法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下，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工联和全国教育工会最近号召举行了反对紧缩政策和失业的大规模的全国行动日。但在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派”领导的联邦德国，赫尔穆特·施密特号召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为了企业主能取得最大利润而放弃罢工和维持“社会和平”。这是不是说卡拉汉和施密特比雷蒙·巴尔更“右”呢？这不是什么招牌或个人气质问题。这不过是说明，社会党可以为陷于困境的大资产阶级提供宝贵的支持。

因此，今天在法国大资产阶级处于四面楚歌并感到其统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对社会党大施压力，使其回到阶级合作的道路上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了。必须指出，社会党在这方面作了让步。如今，正当有可能取得胜利并实现改革的时候，它给大资产阶级提供了出路。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不能装作若无其事。似乎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即使不能改换政治领导人，也总会带来一些变革。这将使法国

人、特别是劳动者陷入最严重的失望。

过去这种失望已经太多了。三十年来，不信守诺言的政府在法国相继上台。多少年来，他们眼见一些人靠左翼纲领竞选上台，随后却执行右翼政策。法国社会党在这一点上倒是功勋卓著的。我们不希望我国人民再遭受这种苦难，几届共和国被引向破产。

不应使千百万法国人失望。因此，当社会党明显地抛弃共同纲领的时候，我们便毫不犹豫地提请他们注意。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让别人去玩弄巧妙的手法，慷慨陈词地抗议，或虚情假意地保证：“请相信我们吧！你们瞧着吧……”事情的症结在于，如果没有真正焕然一新的政策，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改革从而减轻所有生活非常窘迫者的困难、把经济的要害部门从大资本家手中夺过来，并使独立自主的法国拥有在国际范围内担当起新作用的手段，那就无法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就不能为解决危机找到出路。这是左翼政策应有的特点。这也是左翼政策应该保证做到的事情。这不仅是为了在选举中切实打败右翼，而且尤其是为了保证今后实现真正而持久的变革。

选择很简单。

要么执行这种政策，那就要对所有大财团实行国有化，同通货膨胀一刀两断，减少失业，给劳动者新的权利，保障民族独立。这是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这就是变革的道路。

要么拒绝这样做。那么不管讲多少漂亮话、许下多少诺言，最终只能是这种现实：给人民和民族造成苦难的紧缩政策

和忠实地管理大资产阶级的事业。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为了实现联盟，目前该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坚持和迫切要求联盟的原因。这仅仅是出于这种愿望——尽一切努力阻止把我国人民引向令人痛苦而危险的绝望之中。

有些人说我们想闭关自守并执行“一条强硬路线”。我向他们明确地说：不对。我们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路线。我们作出了抉择并要坚持下去，因为这种抉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深刻而持久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选择了变革和联盟。我们选择联盟是为了变革。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没有放弃、今后也永远不会放弃这一目标。

鉴于社会党造成这样的局面，人们经常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联盟有可能实现吗？

对这个问题，我毫不犹豫并满怀信心地回答：有可能！

但我要马上补充说：这取决于你们；是你们焦虑不安而又抱有希望地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最近的事态发展充分表明我们经常讲的：我国人民所需要的联盟不能靠上帝的恩赐来实现，也不能靠上帝的恩赐来维持。这种联盟只能经过紧张持续的政治斗争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加强。

我们常说：联盟是一种战斗。事实证明，联盟每进一步，

都是人民运动努力的结果。我们如何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签署了被社会党拒绝达十三年之久的共同纲领呢？一九七四年又如何使人接受为总统选举提出联合候选人的主张呢？去年如何为市镇选举签订了全国协议呢？这是由于劳动者和男女进步人士的坚决行动，由于每当我们为挽救联盟、巩固联盟和实现联盟而作出努力时，得到了他们的有效支持。象过去一样，今天仍然要靠这种方法才能使联盟摆脱目前面临的困难。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大规模的民主大辩论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加速这一时刻的到来，让劳动者了解事实真相，全力支持我们党的努力，来促使联盟实现。

这是否意味着争取联盟的斗争就是没完没了的从头开始呢？绝对不是！现在已经不是一九五九年我们提出共同纲领思想的时候了。现在已经有千百万人、空前众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民主变革上。显然，罗伯尔·法布里不会掩饰他为摆脱共同纲领而感到庆幸，他曾傲慢地宣称共同纲领使他“难受”。弗朗索瓦·密特朗确实把共同纲领抛在一边以便尽快地投入竞选。但共同纲领已存在五年之久，任何人也无法从思想上把它一笔勾销。所以，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恰恰相反，一切表明人民运动是坚定不移的，变革的意志没有削弱，要求过一种更人道、更公正、更自由生活的愿望没有泯灭。变革始终列入了议事日程。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目标依然如故。我们为打倒右派和真正改变政策而斗争。我们为左翼党就一个良好的共同纲领达成协议而斗争，这个纲领要确定实现这种崭新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我们为在左翼联盟政府中取得应有席位而斗争，

这个政府将负责贯彻上述纲领。

这就是我们行动的意义。

一个强大并有影响的共产党

我们不是那种追求选票、荣誉、议员和部长席位并为此不惜一切的人。同社会党不一样，我们从来不把联盟和争取我们党处于“统治地位”联结在一起。

我们之所以尽一切努力加强我们党的力量，并争取达到一百万党员，我们之所以号召劳动者、民主人士、爱国者和一切渴望联盟和变革的人支持我们，包括选举时投我们的票，这是因为我们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这些力量联合起来，仅仅为实现向我国人民许下的诺言服务，以便使千百万法国人对变革寄予的巨大希望不致落空。

因此，吉斯卡尔·德斯坦不时提到他要努力使多数派向左翼“扩大”，一九七四年他宣称要把我们党影响的选民缩小到低于百分之十五，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如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共同纲领上的签字墨迹未干，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就宣布他的目标是从当时共产党拥有的五百万张选票中夺走三百万张。这确实是一条普遍规律。要走第三条道路，要采取大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某种形式下共同处理危机的解决办法，就必然要削弱共产党。

反之，一个坚定、强大和有影响的共产党的存在，是拯救联盟和保证民主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任何力量也不能使我们背离这些目标。我们为之奋斗的

是更合理、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和新的社会，这正是我国人民所期望的。不管我们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曲折，我们将朝着这些目标迈进。越快越好。

(8)

共产党的学说同你们向天主教徒提出的联合建议相容吗？

我们喜欢直截了当。含混不清没什么好处，也不能持久。因此，我们从来不想掩饰或模糊我们的身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愿望。我们宁愿明确地说清楚思想上的不同、学说上的不同。这倒不是出于宗派主义，只不过是含混不清，尽管能把一切事物说成一个样子，但在选择道路方面会使人犹豫不决。

指导我们的原则

让我们说实话吧：我们坚持我们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我们确实把这种理论看作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建立消灭剥削和压制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战斗工具。没有任何策略上的考虑要使我们去模糊这个理论与其它理论之间的区别，去寻求哲学上不可能的和想象中的一致。

然而，正是由于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才认为归根到底，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的物质状况和这种状况造成的精神

后果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这些才是使人们联合或对立的决定因素，而远非思想意识。

这就是我们确定我们与本国天主教徒关系的基础。

我们认真看待宗教信仰

我必须马上说明，一个共产党人不能冷漠地谈论这个问题，不能用抽象的政治概念来推论。因为这涉及我们共同的日常生活和人的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方面。这是民族共同体的一个主要方面。

确实，法国工人运动曾在一个时期里认为宗教信仰是劳动者之间的一种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教会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关系紧密的一种反应。应该承认，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确实使反教会思想大大滋长起来。这种反教会主义是革命运动初期各种幼稚病的一种表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曾立即唾弃了这种思想。针对自称拥护社会主义而要社会主义去“禁止”宗教信仰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杜林，恩格斯怒不可遏地说：“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①对于持同样立场的布朗基分子，恩格斯严厉谴责他们企图“遵照穆夫提的吩咐使人们成无神论者”^②。

是呀，这是多么的荒谬！对宗教是多么的无知！

我们不能把宗教看作“招摇撞骗的事业”，也不能把它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584页。

成幼稚的轻信。我们并不把天主教徒的信仰看作彻头彻尾的坏东西和工人运动的天生敌人。我们严肃地看待宗教。我们认为，宗教是世界在人们意识里的复杂反映，这个世界在压迫他们，因而需要另一个更幸福的世界。

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①。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躲无情社会制度迫害的避风港。但宗教不仅是卑微者苦难的表现，马克思说它也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

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无视或傲慢地对待生活在不公正的、压迫的世界中的苦难和要求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呢？因为正是这些和我们一样的男男女女、劳动者和普通人感到这种苦难并怀有这种愿望。我们不是为了要反对他们，而是为了支持他们而斗争！

我们是同一文明的子孙

不是有人想让我们对立起来吗？但我们是同一文化、同一历史的子孙。

我不能肯定我们的文化是否象有人说的就是“西方和天主教”的文化。它吸收了多方面的来源。但我国人民的历史发展是在决定我们的风俗、习惯、爱好、思想方法的文化范畴内进行的，这是事实。我们都是共同历史的继承人。正如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页。

里斯·多列士所说的，确实，我们共产党人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提到过去几个世纪中建造的华丽教堂的尖顶耸入云霄，这是人民艺术的精萃。”在我们的党校里，我们教育党员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沿袭了德谟克利特、阿里士多德、笛卡儿、狄德罗、巴贝夫和黑格尔的悠久传统。同样，天主教思想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谁敢用主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历史并把一部分人民排斥在自己的遗产之外？下令建造城堡和教堂的是昔日世界的统治者，但这些城堡和教堂的建造者是今日工人的祖先。农家女贞德信奉上帝，但对于全体法国人来说，她体现了人民对正在形成并即将成为民族的热爱。巴斯德是天主教徒，约里奥·居里是共产党人，但这俩个人都是法国科学界的泰斗。唯物主义者 and 天主教徒曾一起在我国完成了伟大的事业。谁敢说这些人是好法国人，那些人是坏法国人？他们一起创造了法兰西。他们一起保卫了法兰西，在抵抗希特勒入侵者的时候，他们自然地一起并肩战斗。难怪一位共产党诗人阿拉贡歌颂玫瑰和木樨草的结合，歌颂信奉上帝和信上帝者之间的联盟……阿拉贡还说：“在我的诗歌中，圣母和圣徒都占有其地位，但我还是我。”

天主教徒不是屈从者……

而且，如果说天主教建立在一些不可触及的基础上，但它并没有脱离生活和历史发展。这一点在当代尤其是如此。目前，具有空前规模和意义的广阔的解放运动通过各种形式使

世界各国人民卷入其中；在法国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社会斗争，政治辩论的中心问题是选择什么社会的问题。我们不愿干涉教会内部关于礼拜仪式、信仰和信仰内容、信徒的世俗诺言及其形式的讨论和考虑，应由天主教徒本人来决定他们如何成为信徒。我们决不替他们回答这些问题。但对于他们的探讨可能反映世界和我国变化的任何东西，我们不能不给予最大的关注和同情。我们尤其怀着极大的兴趣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不再把他们的信仰看作屈从、逃逸或抚慰。五年前法国主教团全体会议宣布：“时代变了，不公正的现象层出不穷。有些人对此习以为常。在他们看来，这是人类的悲剧……但天主教徒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由于再生的耶稣基督的保佑，天主教徒们怀着希望，尽管这种希望不能在尘世上实现，却仍鼓舞着自己的劳动和斗争。”

我们主张宗教信仰完全自由

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我们不同意根据信奉上帝与否把人们分割开来。的确有一条使我国社会分裂的分界线，除了社会阶层、政治派别和思想倾向的不同外，这条分界线把控制经济和国家机器的少数人划为一方，参加劳动和成为垄断资本各种牺牲品的广大群众为另一方。

因此，我们今天和将来决不向宗教开战。几十年来，从我们的任何出版物和任何活动中都找不到一点伤害教徒及其信仰的言论的。思想交锋吗？对我们希望在互相尊重的情况下进行这种交锋不是要宣传我们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吗？

对，我们是本着积极的、建设性的精神这样做的。反宗教宣传呢？没有，这不是我们的观点。例如，对反宗教展览我们是毫无兴趣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不正当的把戏。

我们相信我们的学说和行动的威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因此，我们对天主教徒说：你们有你们的信仰，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今后我们也将尊重你们的信仰。

在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法国，我们要使每个人——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不信宗教的人——的权利和自由都受到尊重。我们要的是一个在各级组织由劳动人民领导和监督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公民参加各级组织的活动。我们要的是一个使全体人享有文化并拥有发展个性的手段的国家，亦即不属于任何政党和集团所有的国家，一个既不是无神论、也不是天主教的单纯的世俗国家，也就是一个能够为各种不同思想体系自由发展和自由争论提供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国家。

这就要求有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们不愿把这种自由缩小为天主教徒与上帝之间秘密的、甚至地下的个人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自由是个别或集体、公开或私下表达其宗教信仰的自由，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由教会进行宗教教育的自由。

这还要求，任何哲学或学说都不能成为国家哲学或国家学说，也不能成为国民教育机构的学说。相反，我们认为必须为不同思潮和这些思潮的传播和交锋提供情报。

这还要求有法律保证，使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自己的出身或宗教信仰不同而担忧或受歧视。全体公民，无论是天主教

徒抑或无神论者，都应有同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以他认为有效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

天主教教会和其它教会、宗教团体在我们为之奋斗的法国都将享有从事活动的必要自由。它们将可以拥有财产、宣传和出版机构，以及培养神甫的手段。

我要补充说明，如果说教会和民主政权严格分离是教会和国家相互独立的保障，我们认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教会和国家的关系不能建立在敌对的互相蔑视的基础之上。我们希望这种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家和教会在行使其权利和义务时发生问题，我们认为应通过协商来解决。我们希望解决自由教育这个复杂问题时也采取这种办法。

自由教育问题

在这方面，法国遇到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既成现实。存在一些私立学校。于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不是这些学校能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未来的民主国家如何向其提供经费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很多。我们以坦率而负责的精神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们的基本主张是什么？这是要使所有初级教育部门 and 相当大一部分正规教育纳入隶属于国民教育部的庞大的国立和世俗机构；同目前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机构要真正拥有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手段。

必须说明，当我们——我这里指的是共产党人——谈到

世俗教育制度时，我们指的不是一种教条的、狭隘的、反宗教的体制，而是反映出一九七八年法国人民多元化丰富形象的庞大的国家教育机构。换言之，我们主张学校应该坚决尊重各种哲学、伦理和道德观念。一句话，学校应该是民主的。

让我们说实话：我们距离学校“世俗派”观念还很远。我们为争取进步和相互尊重对方信仰基础上的联盟而斗争，我们排除偏执和分裂。因此，在这种庞大的国民教育机构的发展中就不会有报复思想、掠夺和垄断。我们不赞成打一场“学校战”，因为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不会认错敌人。

因此，根据我们的原则，我们决不使用专断方法、采取行政措施。我们认为，民主的目的排除了反民主手段。我们将同法国人一道建设未来的社会，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建设这个社会。这是共产党人的一项基本活动。

是的，在法国情况将有所不同

有人对我们讲：“但你们的建议同法国目前的状况将有所不同，同其它国家包括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情况也有所不同！”确实如此，将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现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教会和教徒的情况各不相同。为了客观地观察形势，显然也应该考虑到其中有些国家中的教会过去是同旧制度密切相联的，有时这些教会本身也曾直接参与对农民的剥削；有时教会还曾竭力反对劳动者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这一切无助于在教会和新政权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一切对这些国家对待宗教信仰以至教徒的态

度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也必须说明——既然我们要说实话——这些国家的许多共产党没有遵循真正社会主义的宗教原则，采取了我在上面提到的“向宗教宣战”的恶劣做法。他们曾经、甚至现在有时还在犯错误。

为什么在我国将会有所不同呢？首先是因为今天在法国，教会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已不一样。其次是因为很久以来共产党在这一方面就确定了明确而开放的立场，而且从现在起就付诸行动了。象其它领域一样，尽管我们也在宗教方面从别国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但任何经验——更不用提错误教训——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一种模式。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走我们自己的路，即适合我们的时代和我国情况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重视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间的探讨、对话、共同行动和联合。实际上，未来将由我们今天一起来创造。

所有要求人类解放的人

我不是作为神学家来宣教，但我确实知道数百万信奉上帝的劳动者的思想特点，他们渴望所有的人都能得到正义、博爱和幸福，渴望在安宁的世界上享有自由。至于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希望什么呢？我们为建立新世界而斗争，在这个新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将建立起以尊重和发展人类个性、互相交流和团结为基础的新关系；这个世界将把家庭从当前受到各种困苦和恐慌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这个世界将使我国人民历史

上形成的精神遗产进一步丰富。

因此，我们热衷于使所有要求人类解放的人站到一起，这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由于思想混乱。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对于天主教徒来说，这是他们的福音主义理想。双方都要求博爱、正义与和平。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因为要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必须组成法兰西人民的广泛联盟，而天主教徒是我国人民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相信，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使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不满足于“共处”，而要互相熟悉，在互相尊重对方特点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为准备和建设一个更为人道的社会采取共同行动。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认识到，建立在人剥削人和利润法则基础上的社会同他们的信仰所提出的要求是水火不相容的。

联合起来争取更美好的世界

有些人已经加入我们的党，他们有理由把我们党看作社会必须进行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没有人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宗教活动或成为无神论者。他们为了真正改变社会而成为共产党员。在我们党内，他们完全有自己的地位，他们同其它党员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担负同样的责任。我们怎么能区别对待呢？我们的入党申请书上确实有“职业”一栏，但没有“宗教信仰”这一栏……

另外，更多的人不是加入共产党，而是与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这种合作、这种谅解和这种联合符合我们经常关心的

使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联合起来改造世界的要求。目前，首先是争取实现民主变革，并进行必要的深刻改革。我们的信念是：共产党人和天主教徒的共同行动今天在法国应当具有新的规模。这种共同行动可以并且应该具有决定的意义。

(9)

你们怎样把热爱民族独立同你们的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我们希望祖国繁荣、伟大与和平，我国人民自由、幸福。这就是我们战斗的意义。

民族遗产的最好捍卫者

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这一说法并不是权宜之计。五十多年前，即一九二六年六月，莫里斯·多列士曾说过：“正是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人，成为民族遗产最好的捍卫者。”从那时起，我们已走过多长的路程呵！现在，我们确实是站在所有争取民族利益和国家独立斗争的第一线，反对既出卖民族利益又抛弃国家独立的大资产阶级。

理由很简单：民族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在我们所有的示威游行中，我们都是把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和象征民族的三色旗紧密地排列在一起。

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的基本目标，即同工人阶级、同今天或明天愿意这样做的所有人、同我国全体人民一

起，引导我们的民族走上使国家的物质资源、人的潜力、我国男女的才能和创造精神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换言之，就是引导我们的民族走上具有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样做是否会使我国不关心他国人民的命运，拒绝对共同的正义事业给予支持，对各大陆受迫害者的呼吁充耳不闻呢？正是大资产阶级的贵族老爷们出于自私的打算对世界冷眼相看的。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人民阵线和解放时期，我国人民曾走在进步的前列并为未来开辟了道路，我国人民从来没有象在这个时期那样伟大，那样受到人们的爱戴，那样受到世界的尊重。我们经常关心的正是使这一伟大的民族传统发扬光大。明天的法国将继承这一伟大的民族传统。我们希望法国成为各国人民的朋友，支持一切正义的斗争。

支持各国劳动者

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认为，国际主义声援不仅是一种义务，而首先是一种态度。确实，我们对各国劳动者感到很亲切并支持他们，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劳动者，世界上所有的劳动者都模模糊糊地多少怀有同一希望：结束剥削。我们对受我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迫的各国人民都感到亲切并支持他们，因为我们不是为了我国人民自由而去剥夺另一国人民的自由而斗争，因为我们完全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我们对在联邦德国遭到“职业禁令”政策打击的、对遭到皮诺切特酷刑折磨的或在印度尼西亚监狱中慢慢死去的那些男女们感到亲切并支持他们，因为我们懂得自由的代价。

而且我们意识到,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每次赢得自由,一个国家的人民每次取得自己的独立,社会主义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取得的每一个成就,对非正义的和贫困的旧世界都是一个打击。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社会进步与和平的事业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我们对使我国最大多数劳动者怀有这种信念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感到自豪。

因此,作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我们对世界上为争取自由、独立、进步、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所有人们表示我们的声援。在法国,没有一个党在这方面能够为曾做了象我们党每天所做的事情而感到自豪。

这种声援对我们来说具有普遍的性质。我们声援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各国人民,同样也声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民主人士。我们声援已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成为帝国主义打击目标的阿尔及利亚,也声援正在为使自己的民族权利被承认而斗争的巴勒斯坦人和遭受骇人听闻的种族主义压迫之害的南非人民。

我们声援在苏丹、伊朗、南朝鲜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和民主人士,也声援智利、乌拉圭或巴西的这些人。

我们毫无歧视地支持世界各地其自由受到损害的一切人,包括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如果那里发生同样的情况。我们国际主义声援的感情不象在某些人身上表现的那种明显的不平衡,他们对布拉格的审判案那么大叫大嚷,而对美国的“威尔明顿十人案”却默不作声。

争取在共产党国家之间建立新型的关系

我们党致力于同反帝、争取独立与和平、争取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一切民主和人民的力量保持友好的、兄弟的和合作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党同其他共产党之间自然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我们认为它们在这些斗争中是本国的先锋队。

这种关系建立在尊重各自独立的基础上。我们不掩盖我们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党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政策，自由地确定自己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法。它从各种经验——其中有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但不把任何经验当做样板。我们不属于任何国际——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三年已经解散，共产党情报局在一九五六年解散——，我们不容许对我们党进行任何干涉或施加任何压力。在共产国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时期，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曾起领导作用。这并不是没有带来损害，也不是没有遇到抵制的。在今天，任何党都不能自称是我们运动的摄政王。

标志着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时期的深刻变化，各国共产党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独创的政策的能力，过去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些必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过去一个集中的组织，变成了各国共产党加在一起的总和。在它面前一下子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更确切地说，在我们看来必须在各国共产党之间探索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我知道，确实有一些外国同志对我们的这种

想法感到惊奇。他们说：“为什么要探索？已经有些原则了……”毫无疑问，是有了一些原则。但原则并不是万灵药方。原则对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具有启示作用，但它不能取而代之。因此必须经常检验在某一特定时刻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否继续适用于新的情况。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否则，在当时曾是一个好的准则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又会变成一种陈规陋习；如果人们不能加以制止，陈规陋习又会变成一种宗教礼仪。生活可能一度适应这种落后状态，但终于会冲破它。冲击可能具有粗暴的形式，但不应该因此而害怕或回避。

对我说来，使我惊奇的不是遇到新事物，而是遇到保守的共产党人。

说实话：对于一些过去未出现过的问题，我们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我们首先看到这些问题提了出来。例如，和平共处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新问题。前者是从时间对社会主义有利这一正确思想出发的；而后者则正在全力以赴地争取尽早结束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是劳动人民生死攸关的利益。一些共产党行使着国家的职责，同另一些共产党所全力反对的制度保持合作的关系（这方面取得很大成绩）。这是正常的，从原则上来说，这里不存在任何矛盾。尽管如此，仍可能在估价上和在做法上产生分歧。尤其是在现有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同国家不分，以致共产党要承受原属于国家应承受的外交约束。这自然是使问题复杂化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要和平共处，我们也要和平共处，但我们同样要我国的社

会主义。因此我们不能接受以国家间的共处为名损害我们为反对大资本的政权、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利益的任何做法。尽管如此，我们意识到要不妥协地进行斗争，以便很好地为和平共处服务。这是因为，为和平共处进行的斗争对大资产阶级的下述企图构成严重障碍，即：它躲在大西洋参谋部的阴暗角落里，始终幻想着对社会主义复仇，一旦有可能，它就将毫不迟疑地把全世界推到战争的灾难中去。其次是因为，如果民主在法国取胜，如果政府中有共产党的部长并按照我们主张的正确的对外政策办事，那么，这就意味着法国为巩固共处、实现军事缓和、确保集体安全、为裁军采取初步措施做出伟大创举。人们可以看到，毫不妥协地完成我们对我国工人阶级、对我国人民的职责不是没有国际主义意义的。

关于国际主义声援

人们已注意到，现在我们宁愿用“国际主义声援”，而不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提法。这也正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在柏林召开的全欧共产党会议的集体声明中所使用的词汇。

这并不是我们对“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这一震撼当代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口号缺乏热情，而是因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现在具有我们不能迁就的模糊的含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经常听到人们赞成这样的思想，即：“忠于”苏联、维护苏联所做的一切、维护在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我们不能接

受这种要求。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舞台上出现时，当它被迫对付勾结在一起的各国帝国主义入侵时，当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建设和恢复、克服经济上的孤立状态、战胜最严重困难时，法国共产党人曾不遗余力地给了它支持。对此，法国共产党人不感到后悔，而是感到自豪。对人类的前途来说，没有任何事件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更为重要、更具有决定意义。因此法国共产党对它的支持是无保留的。这种支持甚至导致法国共产党去支持后来——一直等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被揭发出来是罪行的那些行动。

今天，力量对比已发生变化。苏联已不再是一个被围困的堡垒。它是一个强国，人们甚至说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当然，它受到没有消除敌意的世界一切反动派的仇视，但它也受到尊敬。这种状况是好的。这也带来如下的结果，即国际主义在今天不能把支持苏联作为首要内容，更不能把无条件维护苏联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当做国际主义的准则。我们很多年来就这样说的。我们原以为这一点已得到解决，但现在这一无法辩护的论点又重新出现了。因此最好不要去玩弄字眼。具有普遍性质的、也可以说是“全向的”、自愿的、尊重各自独立和不排除批评精神的国际主义声援，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特点，这种国际主义也是我们日常活动的组成部分。

严重的分歧

人们对我们说：你们变了，你们批评苏联了……

我回答说：必须变。这样做是为了吸取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为了丰富我们的政策。为了更加稳步地和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这也是为了使社会主义本身前进。

确实，越是我国人民渴望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越是有必要和可能使我国走上可导致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社会主义所显示的形象同我们的关系就越加密切，即使这一形象每次都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因此，我们怀着为这一共同理想服务的信念，对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出现的看来是背离这一共同理想的事情坦率地表示我们的看法。

例如，我们并不掩饰我们同苏联共产党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认为，尊重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包括尊重言论和创作自由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在一切地方，在任何必要的时候，都毫无保留地维护这一点。当然对那些被证明是错误、有害、可能损害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的思想，人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反对。对那些根本上损害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也应反对。在这方面，我们知道我们所说的是什么，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用了我们大部分时间。但是我们认为，对于错误思想，必须用其他正确和有说服力的思想去反对它，开展政治思想斗争，而不能采用行政措施，不能采取审查、禁止或镇压的办法。再说，进行思想辩论是防止错误的一种保证。一种思想，仅仅因为是不常见的，可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有的思想尽管是新的和与众不同的，却可能含有一点真理。只有通过辩论，才能使人看清。思想上的千篇一律导致思想僵化。争论促使人们觉醒，使运动向前发展。

当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在斯大林时期发

生的错误、罪行和反社会主义的做法时，我们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把这看成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事件，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打开新的一章。

从二十大得出的一条重要教训是：必须随时提防有人企图以专权和镇压的便利条件来取代在信念、思想的交锋和斗争方面作出的民主的努力。因此，我们对任何地方采取有损于观点、言论和创作自由的镇压措施表示不赞成，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不对在苏联发生的——而且是经常发生的——事件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并不相信某些人对这个国家内的人权命运所做的那些可怕描述；他们夸张的描述是出自憎恨社会主义的恶意。

但是有些事实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苏联当局也并不加以否认。他们为这些事实进行辩解，而我们则坚决表示不赞同。确实，我们号召劳动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我们不能容忍以人类幸福为目标的这一理想被无理的、无法辩解的行为所玷污。这些行为绝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我们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这些行为恰恰发生在其人民已巩固地、最终地团结在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事业周围的国家里。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完全不同意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即政府和共产党对于那些已声明既不损害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损害宪法，而要求切实保障个人和集体自由的人们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开展讨论，而是进行打击。这些男女既不是手持尖刀，也没有挥舞炸弹，而是拿着传单和请愿书。他们是不是批评政府和共产党的政策？他们是不是向外国诉苦？我们认为，这不是对他们进行审判或把他们撤职的一个理由。这种

做法——即使引证法律条文——使我们回想起我们认为已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对过去的这种情况，我们曾加以谴责，我们现在仍然谴责其残余。

声援不排除独立判断

当我们对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提出这些批评时，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我们突然间决定无视这些国家、它们的人民和共产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不，这种贡献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削弱了剥削和压迫的旧制度，从而为劳动人民的斗争，为我们的斗争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它们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是无容置疑的，它们对于和平的贡献是决定性的。我们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共产党是大力声援的，它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正如人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列强是“不会送礼上门的”——的情况下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潜力。但是，这种声援自然不排除独立判断。正因为社会主义理想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当我们认为这种或那种行为危害社会主义理想时，我们在充分意识到我们在国内外应承担的责任的情况下，完全自由地提出我们的意见。

这是不是一种新的态度？是的，这确实是新的态度。这是因为，这方面同其它方面一样，我们从事实中吸取了教训，使我们不得不始终睁大眼睛。我们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已决定这样做，我们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这是否会削弱我们同各国共产党继续保持兄弟关系的意

愿呢？丝毫不会。我们在一起经常这样说：存在分歧不应成为保持这些关系的障碍。

这就是说，人们在含混不清的情况下是办不成任何好事的。当出现不同意见时，必须承认它。必须就此进行讨论，公开地讨论。有人会说，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否将坐收渔利？但谁能那样肯定呢。只要不是挑衅性的、不采用论战语调，那么公开辩论却是推动思考、使正确的解决方法成熟起来、使正确的方针制定出来的手段，而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共产党人从这种讨论中得到的东西比反动派得到的要多得多。而且这是因为共产党人始终是这样做的。其实，辩论在国际共运中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今后它将存在下去，这是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同各个共产党保持关系，这种关系无容置疑是有益的。互派考察团、进行双边会谈能使它们对每个党在斗争中所处的特殊条件，对各自相应制定的政策有更好的了解。发起国际主义的声援，为了和平、缓和和裁军的共同目标而进行共同的干预，也是这种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相反，正象我在柏林全欧共产党会议上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这一类的国际会议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任何为所有的党制定一项共同战略的做法已被绝对排除，因此寻求一些更生动、更灵活、更有效、使人们对当前这个或那个重大问题得以进行深入的、坦率的和直接的讨论，而又不一定通过什么文件来作出结论的那样的集体会晤的新形式是适宜的了。

关于中国共产党

我刚才说，我们准备同各国共产党保持兄弟般的关系。必须明确一点，我这里说的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

我们确实同几乎所有共产党保持这种性质的关系。但中国共产党不在其中，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分歧。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这些分歧甚至是全面的，也就是说涉及北京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方面。此外，当时的领导人曾进行一场反对法国共产党人的激烈运动。接着，一次又一次地发生领导危机。尽管我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党使社会主义具有虚无主义和平均主义的表现，尽管我们对那些连续不断的“清洗”和冲突深为关注，但我们主要是对中国领导人的对外政策表示反对。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曾指出：中国领导人“把国际缓和当作每天攻击的目标，与美国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站在同一阵营中，反对安哥拉人民，与皮诺切特和睦相处。他们表示赞成美军留驻亚洲和西欧，支持德帝国主义的极端分子，热心地呼吁托拉斯的小欧洲实现政治和军事联盟。他们在强行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竭力控制亚洲大陆并对苏联表现出最大的敌视。

“我们明确地说：这个政策完全违背各国人民的、其中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它不仅是没有理智的，而且是危险的。它不仅是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而且会造成威胁世界和平的令人不安的局势。”

毛去世后，我们党向中国共产党发去友好的唁电。在四天后参加《人道报》节活动的广大群众，为这位其名字使人回忆起长征、击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人物默哀一分钟。尽管过去和现在继续存在着使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但任何一个法国共产党人都不能忘记这一伟大的事业。

我不准备谈在最近时期来自北京的各种矛盾的迹象和讲话。要从中得出确切的意义有时是困难的。当前的领导人在谈论一个“新阶段”，在经济、社会方面似乎作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纠正。但是，对外政策似乎基本上仍在继承消极的东西。如果未来能在这方面对我否定，我将感到高兴，因为我们认为，人民中国是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领导这个国家的党是一个共产党。

正如在毛逝世时我们致中国共产党的唁电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我们之间的分歧（既涉及国际问题，也涉及对社会主义的观念本身）使我们的关系恶化而深感遗憾。这既不是我们造成的，也不是我们的愿望”。确实，我们希望在承认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同时恢复我们两党之间的正常关系。我们将不放过任何能够这样做的机会。

欧洲共产主义

还要说几句，关于一个词的问题。

人们经常询问我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问题。事情看来可能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个词既不是法国共产党，也不是任何其它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党发明的。世界上好几名记者在

争夺该词的发明权。

通过这个词，人们联想到的是什么呢？一个肯定的事实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共产党，尽管它们认真考虑到它们的情况不同，但认为它们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是共同的，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相类似的，并提出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做法十分不同的社会主义前景，这种前景的明显特点是关心民主和热爱自由。并不是西欧所有的共产党都采取这个方针。相反，其它大陆的一些共产党则同意这一方针，例如日本共产党和墨西哥共产党。因此，欧洲共产主义一词是选择不当的，但它所要说明的情况则是存在的。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理论家对此问题感到不安或表示不快。他们把欧洲共产主义看成是旨在反对“现有社会主义”的一种什么战争机器、一种什么“分裂”勾当。……这就是再一次把差异和反对等同起来，把创造性的探讨看成一种罪行。我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并不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创建一个新的“中心”。我们毫无意图要重新回到一个新的国际中去，哪怕是地区性的国际。欧洲共产主义也不是一整套理论，因为把墨西哥、日本、法国和其它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人的政策汇集起来是搞不成一套理论的。欧洲共产主义意味着进行独特的探索，选择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与民主的道路，选择多党制和多种思想潮流共存，把一切人民力量团结到一个大多数人参加的运动中来。这种努力比与之相对峙的教条主义者所主张的革出教门要好。尤其是同教条主义者的看法相反，我看不出大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在“发现”欧洲共产主

义之后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欧洲共产主义显示的战斗蓝图——它适合各国的民族现实和我们时代的条件，摒弃一切教条主义，最密切地关注各国人民的忧虑和要求——是我们进行反对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争取民主、独立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有分量的王牌。

建立友好和富有成果的关系

除了共产党外，其它进步力量今天在世界上也起着卓越的作用。一些民族解放运动，民族民主政党正领导着他们国家的人民为争取独立、生活改善、发展和社会正义而斗争。不管这个斗争的政治领导力量是怎样的，我们对这一斗争始终给予积极的支持。法国共产党曾坚持不懈地站在越南人民一边，正如从一开始它就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一样，这是法国共产党的光荣。我们同一大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政党建立了友好和卓有成效的关系。因为我们坚持一切反帝力量在为了我们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斗争中实现必要的联合和联盟这一主张，我们尤其希望发展这种关系。

我们随时准备同所有那些象我们一样认为这样做对维护劳动者利益、争取民主进展、和平与裁军是有益的和适宜的人进行各种形式的对话、接触和接近。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在当前不利于建立这种关系。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项原则措施。尽管在思想信念方面存在差别，我们同样关心同天主教群众的代表力量进行了解、协调彼此关系并开展共同行动。

我们既忠于我们的原则，又持开放态度，并主张联合。在国内方面是如此，在我们的国际主义观点和国际主义活动方面也可以说是如此。

(10)

自从你们的二十二大之后，大家都说你们变了。如今的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你们要的是什么社会主义？

我们党在二十二大上确定了我们称之为走向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我们的倡议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纪元

如今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变成了灾难的预言家。按他们的说法，我们濒临能源匮乏、粮食供给不足的状况。我们消费得太多了，浪费得太多了！似乎增长速度太快是造成一切祸害的根源。因此劳动者现在必须紧缩，必须同意生活得更差些，同时更勤奋地劳动。某些自称要搞社会主义的人也提出必须同意缩减人民大众的消费的主张，认为政治和社会变革无济于事，危机是命里注定的。他们所建议的，归根结蒂，只是用与右翼人士不同的形式去对付危机。

我们不同意让那些生产社会财富并占人口最大多数的人生活在动荡不定、暗淡无光和禁欲主义的社会。人们并非注定要顺从这样的前景。

物质资源和生产出来的财富从未如此之多。为什么生活水平反而要下降，为什么千百万人要遭受贫困？科技进步从未如此之大，知识水平从未如此之高。为什么社会反倒要盲目地前进，要在无法预测前景的情况下生活？从普通常识来讲，这是荒谬、令人反感的。

实际上，自然和人类智慧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它们的极限还是个未知数。诚然，这些资源如今遭到严重的浪费。但浪费的根源不在于增长本身。它的根源在于指导增长的方式和对增长成果的使用。不是增长，而是资本主义在浪费自然资源、人们的生命和希望。

改组经济和社会体制，就有可能消灭这种浪费现象，为我国的发展开辟新纪元，就有可能实现恩格斯所说的从史前到人类历史的过渡，即从一个人人们受盲目力量统治、压迫并任意摆布的社会过渡到一个人们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勇敢前进的社会。

我们要的是一个富足丰盛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终于能够靠舒适的工作过着象样的生活，即拥有他所需要的生存的物质条件，又拥有享受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的广泛可能性。

这是一个安全的社会，只要自己愿意，每个人可以不再在对明天完全捉摸不定的情况下生活，他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同别人建立相互信任和友爱的关系。

我们要的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工人为他自己并为自由、平等的劳动者组成的整个集体而劳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将被消灭。

最后，这个社会将是一个自由和负责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因为他有这方面的权利、条件和时间——参与管理公众事务。

总之，这将是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它符合我国广大男女群众的深切愿望。

我国青年的宏伟蓝图

这个社会将尤其为我国人民中特别受利润高于一切的制度抑制和折磨的那部分人，即年青人，开创未来的前景。我想对此多谈几句，因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未来的重大问题。

今天，我国青年所处的境况是对现行制度起诉的主要内容之一。很久以前，就有一个法国人谈论过做年青人的苦衷。如今，当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为失业、挫折和受刁难而苦恼，并在强大、无耻和不人道的政权面前强烈地感到孤独和无能为力时，这个法国人又将说些什么呢？

对广大青年没有时间和条件来提高自己的专业和文化知识并进行娱乐活动，一句话，没有时间和条件去生活，怎能不感到愤慨呢？他们渴望着富有人情的关系、友谊和爱情，但在道路的尽头等待他们的却是失望或绝望。青年人的特点是，他们正处在一个想充分利用生活、精力充沛、富有创造性的想

象力并渴望挑起重担的时期。

这种马尔萨斯制度糟蹋、浪费了多少人类财富啊！请想一想在这些青年人中默默无闻的优秀工人、艺术家和学者以及被埋没的智慧和才能吧！现政权不仅没有赋予青年人取得成就的手段，反而竭力孤立、分隔青年人，抛弃他们。在社会方面，现政权把青年人当作替罪羔羊，横加责难，竭力煽动不容忍青年人的情绪，对那些渴望变革并要求变革的年轻人策动了一场名符其实的清扫。在经济方面，它对青年人，特别是年轻姑娘，在工资和就业问题上实行可耻的歧视。在政治方面，它阻止那些拒绝服从它的无情法规的人担任负责工作。在文化方面，它不给青年人提供进一步深造、提高文化素养和充分发展的条件。

我理解为什么青年人如此迫切要求变革现状。

他们在我们的斗争中占有特殊地位。作为不惧怕变革并衷心祝愿变革的青年人；他们在一九七八年将有机会——往往是第一次——明确并有效地通过投票来表明自己的特殊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不会排斥他们或仅仅把他们当作一批劳动力来使用，而且将注意倾听青年人的呼声，坚定地依靠他们。

在社会主义的法国，青年人将有自己的职业；有工作做，也有娱乐。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让他们发展自己的个性，这是社会本身的需要，也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在这个新法兰西里，青年人也同样有发言权。他们将在社会生活的各级组织参与制定政策。他们众多的人数和革新的才能将为民

主服务。

说实话，群众只能听命于“智囊团”的社会，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差得不能再远了。社会主义的法兰西将始终需要从青年中汲取在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丰富、社会取得普遍进步的道路上前进所必需的激情和动力。

这就是我们向劳动者、人民和青年人提出要努力争取实现的宏伟蓝图。

法国自身的特性

当然，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完成。但社会主义无可比拟的力量正是由于它是每个现代国家发展本身的需要而产生的。

这就是说，这一目标以人民所熟悉的、同自己国家生活相关联的形式深入到每个国家的生活中去，它是——而且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创造。它不是一个预定的公式，可以到任何实际状况中去套用的。它不能把任何外国经验当模式，尽管应该——这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些经验中得出正反两方面的教益。

法国需要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但这种制度将具有它自身的特性。当我们党的二十二大确定了我们所提出的确实是新的展望时，正是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了我们的代表大会。

如果需要尽可能简短地概括这一展望的话，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建议我国人民把民主、自由作为争取社会必要变革的

主要战斗武器，同时作为要建设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这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只有为争取越来越深刻的民主变革而斗争，才有可能始终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方向改变力量对比，争取大多数人民投入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

这些变革不能是肤浅的，既要触及经济又要触及国家体制，触及整个社会生活。需要建立的是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充分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民主制度。

触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改革

这首先要求生产和交换的主要手段归整个民族所有。银行和大企业属于整个社会所有是为行之有效的计划提供基础、保证持续不断的社会进步，使科学、技术各个生产领域和国家的各个地区能协调发展以及保证财政和外贸平衡所必不可少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一，如果这一条件不具备，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它们没有把结束大资产阶级对它们领导过的或目前正在领导的国家的主要资源的控制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们未能在任何地方实现社会主义。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想在法国搞反动宣传称之为“集体主义”的东西，即剥夺个人财产、实行一体化和强制呢？我们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

首先，我们当然不打算侵犯个人对各种日常消费资料的所有权，也不反对这种财产通过继承来实行转让。例如，对住

宅、房产或公寓住房就是这样。

其次，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根据这一要求，社会所有制将具有如国有化、合作所有制、市、省和地区所有制等各种形式。同时，在一系列领域里，（手工、商业和工业的）小私人所有制和家庭方式的农业耕作可以更好地满足需要。我们也考虑到国际上的经验，准备在社会主义的法国保留这些所有制形式。

第三，垄断集团对企业实行名符其实的专政，企图指挥全部国家生活的技术官僚正在现政权下进一步发展；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对地方性的集体企业实行无孔不入的管制。今天，我们反对这种专制主义，反对这种令人窒息的集权制。但这决不是为了明天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性！相反，我们要求国有化的企业能在管理方面拥有自主权；要求在劳动群众和用户的参与下民主地制订计划；要求企业管理也是民主的，就是说劳动者——工人、职员、工程师和干部——越来越积极地参加管理。同样，我们要求市镇、省和地区能成为真正的决策中心和民主管理的中心。

丰富、生动的文化生活

我们对文化生活的设想也出自同样的考虑。我们要的文化，不再是一种商品，也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我国所有男子和妇女的财富。在社会主义的法国，文化将发展我国的伟大传统，注意吸取所有的外国长处，它将更加广泛、生动，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它将从各种各样的才华和每个人自由地发展其

自身特长的条件中进一步丰富起来。它将对一切知识、一切研究和创造开放。

我想就这点再谈一下。鉴于一些牵涉到我们理论学说的本身性质、我们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我们对形势变化的关注，我们特别感到社会对持续不断的、各种形式的创作和研究的需求。而创作和自由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举例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束缚艺术、控制它、检查它的原因所在。我们不愿意向创作者强加灵感的来源。当然，我们认为他如果参加人民的斗争，就能发现新的源泉，他如果积极投身于复杂多变的历史运动就可以丰富他的亲身实践。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让他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爱好和特性。

我们并不惧怕革新；它是我们政策的特征。而且我们认为各种艺术流派之间的交锋，就同科学界的不同学派一样，是丰富多彩的创造性活动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总结了过去错误的教训。当然，我们对这问题的看法并不是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尽管在那里，社会主义使整个人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确实，我们在这问题上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有分歧，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没有研究，没有不同的流派和学派，没有它们之间的交锋，就不可能设想会有什么文艺创作。这是我们的既定立场。给艺术作品判满分或不及格，这不是政治局的事情。

总之，我们不要摧残艺术的一体化，而要丰富艺术的多样化。那种在同一个模子里浇灌出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的所谓“兵营共产主义”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对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是生动、

灵活、有发明创造的，它鼓励多种多样的解决办法并促进丰富多采的创议。

民主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政权也真正成为整个劳动人民的政权，而工人阶级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但仅仅确定政权的性质是不够的，还必须确定它的形式和运转方式。对此，我们认为，法国的社会主义应当考虑到我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喜爱的民主生活的形式，这是因为这些形式是若干世纪斗争的结果，它们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

因此，我们极其重视代议制机构，它们构成政治生活的传统因素。它们一旦民主化了，将发挥重要作用。议会就是这样。在保证真正有全民代表性、按比例代表制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将成为人民和国家意志的有效工具。市、省和地区议会亦是如此，它们的职权将进一步扩大，物质力量更加雄厚。

同样，对一些新的机构也是这样，不论是在制定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国民计划方面，还是在企业一级建立这些机构都是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任务所必不可少的。

此外，国家将是世俗的，不会有什么官方哲学。尽管国家和教会的分离必须得到尊重，但信仰自由、宗教信仰和教会特殊活动的自由将得到保障，使之不受到任何迫害或行政镇压。

根据工会在我国发展的传统，本着尊重工会的独立性及其群众组织的特点，工会将扩大并保障自己的权利和作用，以便维护劳动者的利益。民主的群众组织的活动，一切有利于

劳动者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及领导的创举、它们对当选负责人活动的监督，都将受到鼓励。

至于政党，包括反对党，它们将拥有组织起来并开展活动的自由。我们确实认为多党制——在各种程度上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愿望——不仅是法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历史组成部分，而且是民主言论和民主监督的渠道之一。这就是我们说任何政党都不应与国家等同起来的原因。

最后，法国的社会主义不仅要维护和保障我国人民已经赢得的——个人的和集体的——权利和自由，而且要扩大这些权利和自由，用新的、更广泛、更深刻的民主生活形式去丰富它们。确实，我们坚信，为了保证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并不在于剥夺构成反动力量的少数人的自由，而是要把自由给予构成民族大多数的劳动者。反动派能否组织反动政党？他们今天就是这样做的，将来也不会是什么新鲜事。相反，诸如劳动者在企业里拥有更广泛的权利，他们的代表理所当然地在电视上讲话，警察机构民主化之类的事情倒将是重要的新事物。他们将从而拥有有效的手段去同反动派的经济破坏进行斗争，广泛地宣传自己的立场、思想和行动并使之得到支持，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击败自己的对手。劳动者将有力量；由于他们有权而更加有力量。

为什么在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

在我们看来，民主和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二者是不可

分割的。

因此，人们显然不能把我们向劳动者、向我国人民建议的东西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专政”必然使人联想到对民主的否定。至于“无产阶级”这一术语，今天指的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工人阶级的核心部分。虽然它起着主要作用，但它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全部，更不是劳动者的全部，而我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权将在劳动者中间产生。

另一方面——这比就措辞进行讨论更为重要——无产阶级专政今后指的是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具体实验，它并不符合——前面已说明了——我们为我国制定的非常不同的发展前景。

所以，我们二十二大曾决定在我们的奋斗目标中不再提无产阶级专政，并责成下一次代表大会对党章的前言作相应的修改。

在把这项建议提交给我们的代表大会之后，我立即联想起鼓舞着我们的理想，我便引用了帕布洛·聂鲁达回忆录中的几段话：“我想在一个不再有被革出教门的人的世界上生活。我不会把任何人逐出教门。我明天不会对埃尔·塔博神甫说：‘你不要再给任何人洗礼了，因为你是反共分子’。我也不会对另一个人说：‘我不发表你的诗词、你的作品，因为你是反共分子’。我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那里的人是通情达理的，也仅仅是这样；他们不受任何规则、言辞或标签的纠缠……我希望再也不会有人在市政府门口等待某个人以便将他逮捕，把他驱逐出境……我希望绝大多数人（真正的多

数，即：大家）都能够说话、写作、念书、听讲和得到充分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的理想，这就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民主是成功的条件和保障

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这个广泛的变革将是，而且只能是在每一阶段通过普选制和斗争表现出来的、由多数人参加的人民运动的结果。如同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并不把政治上的多数和算术上的多数分割开来。它们应当而且是能够吻合的。我们过去说过，现在仍重复说：应当由直接、无记名、按比例的普选制来认可我国人民为决定自己的前途而作出的选择。我们将在任何情况下服从它的裁决，即使它决定要倒退或撤销对我们的信任。

同时，如果选举之前没有进行人民群众经常性的、多种形式的活动，以及选举之后没有这些活动来加以保证，那么光凭选举活动作出决策肯定是不够的。尤其是当大资产阶级一旦在政治上被击败，总是企图通过阻止经济和社会进步政策（人民群众联合在这一政策的周围）的执行，来重新建立有利于它的力量对比时，更是如此。它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或许首先包括经济和生产方面的形式来进行这场斗争，在智利曾发生的情况以及目前葡萄牙正在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团结在一个由多数人参加的、强大运动中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不间断地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行动，看来是必不

可少的。民主的道路，也就是阶级斗争的道路，除了我们的计划中未予列入的一种形式，即内战以外，这场斗争采取并将会采取一切形式来进行。

另外，正是主要在发动群众这一问题上表现出革命潮流同改良主义潮流之间的区别，就是说在那些不仅是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是在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与那些没有真正否定资本主义的人之间的差异。

确实，光谈论社会主义是不够的。联合一个多数派也是不够的。如果不发动群众反对大资产阶级，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而只会在大资产阶级的要求面前屈服或被它摧垮。

我们共产党人要使我国人民避免这两种可能。我们希望取得持久的成就。无论是为了今天实现民主变革，还是为了明天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若想获胜，就必须不仅仅有一个绝大多数人参加的运动，而且要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水平和决心的运动，当我们这样说时，我们正是从这一愿望出发的。这样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领导作用

在这场斗争中，有一支起着首要作用、组织者作用和领导作用的社会力量，这就是工人阶级。只有当在任何情况下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政党——我指的是法国共产党——表明它有能力在社会和政治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时，工人阶级才能发挥这种必不可少的作用。

起领导作用，这是所有政党的正当愿望。为什么别的党

可以有这种愿望而我们就不能有呢？

也许，有些人觉得，这是因为一旦我们共产党人执政，我们可能会排斥别人？在我们的实践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实这种担忧。不论是在我们曾经参政的政府中，还是在我们如今领导的许多城市里，我们都从未排斥过任何人，在那里，我们甚至给我们的合作者一些我们完全可以不给的席位，因为我们是单独地掌握绝对多数。哪个政党能做到这点？一个也没有。

今后，我们所建议的一切都会说明那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想法，即：在我国，必须靠一个党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之间建立持久的、基于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每个合作者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事实上，从今天起，我们就把在争取社会变革的斗争中和在人民运动中发挥我们的领导作用当作自己的职责。每个人都可以看一下这究竟具体意味着什么。的确，当我们制定共同纲领，争取别的力量对极左组织采取正确态度，号召劳动者反对紧缩政策以及自己置身于劳动群众维护日常利益的斗争前列，推动国有化主张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因此，行使领导作用没有任何行政的特征。这不等于垄断或统治。

与我们对手的所作所为相反，我们并不想用党来取代国家机关、代议制机构或行政机构。共产党的作用将是在每个阶段为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发展指出前景，为此目的而提出一些必要的措施，推动并组织社会运动向前发展。这种先锋作用无法强加，而是通过在日常活动中具体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对人民利益的忠诚而实现的。

我们的意愿并不带有排他性的特征。发挥领导作用，就是说在今天和明天，要首先致力于在实现共同义务的活动 中，在权利和义务均等的基础上把一切民主和革命的力量汇集在一起并进行合作。这意味着我们党要善于采取行动，为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而运用一切可能的关系、合作和联合行动的形式。这也包括进行自由批评的权利和义务，以便不断地开导、扩大并提高人民力量运动。

我们并不惧怕竞赛。我们要求的只是忠诚正直，除此之外别无他求。我们今天和将来都对我们党的群众活动、对真正的人民运动充满信心。这种人民运动在向前发展的同时，应该而且能够将联盟和整个社会推向前进。

历史——首先是我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把思想禁锢起来，使千百万公民受个人专权、受铁板一块的社会任意摆布，乃是幻想。这正是大资产阶级的愿望，而又正是这种愿望使得大资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因为恰恰相反，现代社会需要大家的思想更加活跃，积极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的确，这就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除了民主道路以外，没有更好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捷径。对我们来说，民主到头就是社会主义。

以上简单阐述了我们为法国提出的新的、独特的社会主义以及为实现社会主义而确定的独特道路的梗概。

我们的步骤来得远也走得远

在从事这种独创事业时，我们党丝毫没有去为了创新而

创新，为了企图寻求选举成果而不惜作出原则让步。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的步骤来得远也走得远。

我们要在法国搞社会主义。我们的斗争战略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从我们党的一些政治活动中逐渐形成的。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步伐加快了。法国和国际形势发生的新的、有意义的发展促进了我们的思考。

对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

进行这种思考的首要原因，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危机以及危机的深化。

一九六八年五、六月爆发的强大的斗争运动是危机的首次重要表现、首次重要的揭示。我们党懂得如何估量这一运动的意义，并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通过的《香比尼宣言》里得出了一些积极的、大胆的结论。危机接着又进一步发展了。根据客观事实和共产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我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人道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了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从这一分析中越来越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形势使深刻变革的问题（不仅是变换政府和政策，而是改变社会）提上了政治思想斗争的日程。我们所采取的一些重大的政治行动走在人民运动的前头并有力地促进了运动的开展。

活生生的事实促使我们去回答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法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怎样为实现这种社会开辟道路？我们的分析要求我们用民主和自由来作出回答。

确实，法国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显然在于工业和金融集

团及其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对经济、国家和整个社会生活实行的令人窒息的统治。它们控制着国家活动的关键部门。政权在他们手里。近三十年来，它们一直把劳动者及其代表排斥在政权之外，竭力削减民主的权利和自由，以便进一步限制劳动群众——即绝大多数人民——对公众事务的处理进行干预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不从这一分析中得出象我们在二十二大上所作的结论，即：“必须从少数人对全体人民行使的专制主义过渡到每个男子和妇女都能对一切关系到自己的生活、工作、企业的管理、国家的命运等问题积极进行干预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和经济民主制度”？怎么能不看到在为走向更公正、更人道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开辟道路的斗争中，民主和自由变成了劳动者和人民手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专用武器呢？

这就是近几年来我们从对法国所作的思索中得出的教益。

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分析

我们从分析国际形势发展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证实了这一教益。这是我们思索的第二来源。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对国际事件是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的。首先，过去的年月证实了力量对比在朝着有利于进步和革命力量的方向逐步变化。和平共处已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同时，每个国家的人民自由选择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增加了。我们认为，必须根据这些

新的情况为我国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我顺便补充一句，我们也有责任——况且我们也是这样做了——确定一个从我们的地理位置考虑，能防止国际冲突风险的战略。我们不认为和平共处就等于维持社会现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维护这种共处。我们既要和平，也要独立和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还有智利和葡萄牙的情况。在考虑到各民族不同特点的情况下，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得出了同样的教训，即：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依靠包括国内无可争议的绝大多数人参加的广泛、强大的人民运动。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这一民主运动。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得出的教益

最后，思索的第三个来源——这并不等于不重要——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发展的实践。共产党人一向把自由、民主看作是鼓舞他们的理想和他们希望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组成部分。作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先锋队，他们从未考虑过用一种剥削取代另一种剥削，用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就是结束一切压迫，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给每个人不断完善的自由。他们的斗争没有另外的目的。

确实，一个社会的民主生活形式可以变化，而且根据民族和历史的传统及特点，必然会发生很大变化。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宣告了新的、丰富的民主形式——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的极其艰巨的条件从早期开始就塑造了苏联政治生活的模式。人们懂得，由于当时的条件，必须

在一段时间里对民主进行某些限制，并实行严格的集中；简言之，就是在一切方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斯大林领导下，本应是临时性的东西被不适当地延续下去了。原系特殊的情况变成了常规。官僚和专制领导的现象发展起来了，挫伤了群众的创造性和责任感。更为严重的是进行了毫无道理的镇压，使许多无辜者受害。苏联共产党一九五六年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巨大功绩在于它揭露了这些悲剧性的错误，谴责了这些背离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罪行，并对此作了公开的批评和纠正。随后的时期中，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但在这次勇敢、及时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二十多年的今天，是否能说已经从中得出了所有教训？由于一些事实——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表明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和无理的镇压继续存在，因此我们就更无法用肯定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谈这一点时，丝毫没有教训别人的意图，也没有插手应由兄弟党自己解决的问题的欲望。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和为争取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而斗争的利益。而这也是我们的事情。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六十年、二十大召开二十年之后，不可能、也不能设想把超出领导机构评价范围的任何公开言论都看作是不同政见，并把不同政见又都看成是犯罪。这不是什么细节问题，而是实质问题。任何社会不经过斗争、争论、思想交锋和交流建议、不让公民参与公众事务就不能向前发展。与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相比，社会主义更是如此。因为它是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这就是说，由于适当的方法和机构的发展，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思想和意见的民主、自由的交

锋——我们并没有把“西方民主”作为普遍模式来加以推广！——都应当能得到蓬勃发展。这对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需要，尤其是在国家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必要的。只要观察一下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问题，就能看清这一点。必须补充说，在当前和平共处的进展更强有力地提出了究竟哪种制度能和平地——不仅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且也在自由方面——最终证明它具有优越性的时代里，这种必要性也是由于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加剧而产生的。以上就是我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也是为什么在关于法国前途问题上，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和错误中得出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对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只有而且必须在民主过程中并通过民主、在自由过程中并通过自由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对各方面现实所作的深刻分析同我们的原则信念融合在一起，导致我们二十二大所作出的基本结论：必须为法国开辟一条走向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

从“都尔”到二十二大

有人说，当我们如此确定了我们的政治战略时，我们对前辈们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某日在都尔作出的抉择提出了质疑。这是十分荒谬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都尔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决定将社会党改变成共产党的这一抉择是正确的、可喜的决定，是二十世纪里实现的最符合法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行动。

一九二〇年时，必须使法国劳动者从陷入社会党推行的

阶级合作政策的泥坑中解脱出来，必须为建立一个真正能够把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推向前进的战斗的党打下基础。都尔大会正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对。没有自己的共产党，法国劳动者就只能永远是一群任资产阶级随意奴役剥削的劳动力，一批被卷进我国历史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血腥战争冒险之中的无声无息的小卒。法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使法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能够卓有成效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使他们站在保卫国家利益的斗争前列，而“被纳入”别人想把他们排斥的民族之中；使他们为了执行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而组成一切人民力量联合的中心；并使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长足的进展。这是任何别的政党无法自诩的斗争总结，是每个共产党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感到自豪的历史。

诚然，在这一切中间并非没有错误和缺点的。任何人类的事业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明天，那些研究我们经历的人肯定会从中发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是十分正常的。但事实毕竟是：在争取正义、自由、法国劳动者和人民的解放、人民力量的联合、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以及世界各国劳动群众和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团结的斗争中，法国共产党人始终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今天，如果说真正的政治变革的前景已在地平线上出现，谁又能否认共产党在这里面所作出的贡献？如果共产党在自己的分析中思想僵化，坚持一成不变的立场，对事态的发展视而不见，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它充分考虑形势的变化，并果敢地决定一些必要的行动，比如在三十年代发展人民阵线和法

兰西民族联盟的政策，或是我们为有一个好的左翼共同纲领而进行的斗争，就是两个具有创造性的例子。

对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这一步骤是很自然的。我们常说：先锋作用不能靠颁布法令来实现，而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争取。如果共产党人只满足于翻来复去地重复不符合本国情况和时代特点的现成公式，那他们怎么能发挥这种作用呢？墨守成规和机械模仿不是革命的美德。时间不等人，任何迟缓都是有害的。新的形势要求有新的答案。我们的二十二大就回答了这一要求。正如人们所说的，“二十二大的思想”在国内已产生深刻的反响和巨大的兴趣。而我们仅仅是开始。我们决心耐心持久、稳步并坚决地使这些思想继续发展。我们满怀信心。

附 录

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 关于共同施政的联合声明

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的代表按照他们商定的那样在国民议会选举之后进行了会谈，他们对法国人民刚刚所作出的抉择感到高兴。法国人民在六月二十一日的投票肯定了五月十日的投票，使总统多数派在国民议会中取得了大多数席位。

因此，实施我国所期待的改革所需的条件已经具备。

为了就共同施政的方针取得一致意见，两党主要讨论了双方在上一次会晤时所争论过的问题。

两党认识到自己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承担的责任，表示决心推行法国男女公民通过选举弗朗索瓦·密特朗任共和国总统所选择的新政策。两党将在国民议会中通过刚刚组成的多数派这样做，在政府里团结一致地这样做，同时还将在地方和大区政府和企业里在尊重法制和政党各自职责的情况下这样做。为此，两党重申在坚持本党的个性和基本立场的同时，将以国家所作的抉择和两党在讨论中确认的一致点作为各方面工作的基础。

现在通过政府首批措施所奉行的改革政策将继续下去。许下的诺言将付诸实现。这种改革将象开始时执行的那样，通过民主道路，按照普选反映出来的意志去进行。

这种改革主要包括在未来几个月里将采取的实现社会公正和提高最困难的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新措施。这一改革将按照危机的形势、法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事实和必要的经济与金融平衡所要求的变化速度分阶段进行。

本着同样的精神，两党认为在工会组织和雇主之间进行的谈判结束之后，应尽快准备关于减少劳动时间的立法工作。然后，在确定了法律范围后，就应在政府的推动之下着手进行新的谈判，以便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必要时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具体确定执行的方法和日程。

两党认为，公共部门的扩大是使计划取得成效和民主化的保证。双方一致同意公共部门的扩大和组织程序将按五月十日确定的建议进行。

关于国内形势，两党认为有必要制订一项为新的经济增长和有效地对付失业而创造条件的两年复兴计划。两党支持缩小社会不平等的政策。双方将致力于保障和扩大各种自由、扩大劳动者的权力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

两党支持法国在保持当前结盟的情况下，在保证欧洲和世界的力量平衡以及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的同时，为了和平和逐步裁军——以便同时解散各军事集团——而采取的国际行动。本着这一精神，它们主张很快就限制和裁减欧洲军备的问题进行国际谈判。这一谈判主要应当讨论苏联“SS—20”导弹的问题和关于部署美国“潘兴—II”式导弹的决定。

两党将为尊重各国人民自决，尊重各国间的团结，尊重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并为各国应有自己安全的权利而采取行动。它们将使这些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

根据这些原则，两党确认阿富汗人民有选择自己的制度和政府的权利。两党主张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停止一切外来干涉。

考虑到由戴维营协议所造成的局势，两党重申，以色列以及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享有安全和存在的权利；同时，巴勒斯坦人民也享有拥有祖国的权利。

两党积极支持法国在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和合法利益的同时，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机构的活动，参与其共同政策的制订工作。两党支持在社会方面的共同政策，以便维护农业和受到威胁的部门，加强科研和尖端工业。

两党谈到了波兰局势的变化，希望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能自己很好地完成它们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和民主革新的进程。

两党表示要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支援正在为自己的民族解放、发展以及民主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如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人民）。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